

肯尼迪

李发 编

外国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肯 尼 迪

李 发 编著

目 录

一、出身豪门.....	1
二、从哈佛到海军.....	7
三、崭露头角	11
四、走入政坛	15
五、白宫逐鹿	23
六、总统候选人	39
七、入主白宫	56
八、白宫的女主人	65
九、古巴事件	70
十、振兴经济	85
十一、血洒政坛	90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在美国，在华盛顿，在浑浊的波托马克河对岸，一片苍翠而平坦的山坡从林肯纪念碑迤迤升向罗伯特·E·李的故居。人们在晴朗的秋天，从这座山的半山腰可以看到华盛顿的大部分庄严景象，三座大理石塑像和纪念碑——为纪念三位为美国国民衷心感激和被他们公认为伟大领袖的总统。远处，国会大厦的圆顶覆盖着一个“智慧与愚蠢”总统的报复与敌意的对抗、种种的政治思想与形形色色的思想意识较量的场所。右边矗立着迷宫式的五角大楼。在这片绿草如茵的山坡上，可以看到一些铭刻着“应征的美国青年战士之墓”的朴素的墓碑，往左，远在一片绿树屏障的后边，隐藏着一座白色的河岩建筑物，这就是美国行政权力机关所在地。在这里，上演着一幕幕比任何舞台更多的“戏剧”，既有喜剧又有悲剧。

约翰·菲茨杰拉德就是这些剧中的一位主角。

一、出身豪门

1917年5月19日，约翰·F·肯尼迪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郊外的布鲁克林。他是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的次子。如果你想从这里就开始走近肯尼迪，认识肯尼迪的话，那你将不得不先走近肯尼迪家族。约·F·肯尼迪作为肯尼迪家族的一员，他所走出的每一步都受到家族的影响，物质的、精神的。总之，离开家族的肯尼迪就不会是你想认识的肯尼迪了。

肯尼迪是爱尔兰人的后裔，他的曾祖父帕特里克·肯尼迪是一名酒商，1848年从爱尔兰韦克斯福德郡移居波士顿。他的祖父帕特里克·J·肯尼迪曾在马萨诸塞州众议院（1886～1890）和参议院（1892～1893）任职。他的外祖父约·F·菲茨杰拉德曾在马萨诸塞州参议院（1893～1894）和联邦参议院（1895～1901，1919年）任职，并担任波士顿市市长（1906、1907、1910～1914年）

其父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1888年生于波士顿，191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此后从事银行业。1914年在波士顿东区哥伦比亚信托银行当总经理，在一战期间，他就已经成为伯明翰造船公司下属一个分厂的副总经理。他在战后发了大财，搞股票投机生意赚了大钱，成了百万富翁。但约·帕·肯尼迪的生财之路并不到此而止。20年代后期，他去了好

莱坞，大约有三年之久，他从事一个意想不到的赚大钱的暴发行业，因为这个行业迎合了自己制作的要求，每周有六千万美国人去看电影。肯尼迪从制作成本低廉的汤姆·密克斯的西部片和像《一个穷姑娘的浪漫史》与《红热蹄》之类的情节片中赚了六百万美元。

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末，活力充沛的乔·肯尼迪与其妻罗斯·肯尼迪已有了几个孩子。把小肯尼迪们扶养成人是他们共同的事业。罗斯对他们既严加管教又无微不至地关怀，对他们的成长都不记录，而是很有策略的给他们一些小条子，提醒他们该怎么做，或者以简单的书面形式来教导他们。罗斯对孩子们细小的事情上都要严加训练，例如如何正确使用“I”、（我）“me”（我），使他们将来不致讲错。正是这种训练的方式给年幼的杰克（约翰·F·肯尼迪）良好的家庭教化，使他在迈出家门之前，就清楚地知道了该和什么样的人讲什么样的话，讲话时应用什么样的眼神与语调。

父亲对于其子女的希望首先集中在大儿子小乔身上。小乔酷似肯尼迪，富有进取心，冲劲十足。他曾宣称：“有一天，我会当总统。”这也许表明了是他父亲的遗传和职责在他受过严格的训练的身心中留下的观念。

杰克·肯尼迪备受小乔的欺侮。后来他也不顾要尊敬死者的传统，谈到乔的“急躁的脾气”和乔的“似笑非笑的冷笑，好像他在戏弄你”。有意思的是：从一张早年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两兄弟手挽着手，但小杰克露出一副苦相，因为乔使劲拧着他的手。然而当他们的父亲不在家的时候，乔称职地

帮助管教他的弟弟妹妹，他们既爱他又怕他。

大学毕业后，乔去海军服役，在诺曼底登陆的战役里，他加入了战斗。一个阴霾的夏日，虽然肯尼迪曾被警告过飞机上的发射系统有点毛病，可能引起危险，但是年轻的肯尼迪指挥的一架载着 11 吨 PB₄Y 的飞机还是起飞了。飞机在英国南部上空爆炸。这是大战中英国上空发生的最大一次空中爆炸。乔所受的教育是颂扬成就与冒险精神，就是这种教育将造就一位美国总统，乔曾留言转致他的父亲：“如果我回不来的话，请告诉我父亲……我非常爱他。”几个月以后发现，乔打算袭击的目标在他们行动之前的几个月就早已放弃了。1948 年杰克又失去了他富有生气的妹妹凯瑟琳，她死于一次飞机失事；凯瑟琳的英国军官丈夫于乔牺牲的同年在战争中阵亡。老乔·肯尼迪的“希望”也因此“暂时破灭”，因为他失去了肯尼迪家族中公认的最可能成为未来美国总统的宝贝儿子。而令老肯尼迪不会失望太久的是他还拥有的生性聪颖且心怀大志的后来真正的美国总统——杰克。

杰克比乔聪明，也比较书生气，他正在逐步发迹。杰克还是个孩子时，对他母亲说，“如果你读书太多的话，你一定会发疯的。”有一次在耶稣受难之日，杰克的母亲在教堂礼拜，她要求每个孩子祈求自己将来能安逸地死去。其他孩子都默然同意了，唯独杰克却说他宁可祈求赐予他两只小狗。孩子们中只有他可以不会因为吃饭时迟到或者不整理他的房间而挨骂。也许他之所以可以享受不受处罚的特权是因为他经常生病。1920 年他患猩红热，几乎死去。他不是生这个病，就是

生那个病：猩红热、百日咳、麻疹、水痘、支气管炎、扁桃体炎、阑尾炎、黄疸和有病的背部。他的兄弟经常开玩笑说：“杰克如此多病，连蚊子咬它时也要冒很大的危险。”他躺在床上养病，什么书都看，他在乔特预备学校里虽然成绩不突出，却深受同学们的喜爱。他在学校里喜欢开玩笑。有一次挑动同学把宿舍里所有的枕头都塞到一个朋友房间里。一位熟悉他的人回忆说：“他们的英语老师对杰克说，他有写作才能。”；还回忆说：“电台举办‘知识’竞赛节目，杰克大声对着收音机回答提问。”一位历史老师回忆杰克说：“他是少数几个智力非凡的人物之一。”而且，杰克是乔特学校中唯一每天看《纽约时报》的学生，他显然是循着他父亲设计的自我提高的道路前进。在哈佛，杰克起初的路也许并不坦荡，他第一学期的成绩不甚理想，也许用“很差”一词更为准确一些。但杰克可不是那么容易败的，他的成绩也随着他的努力而逐步好转，最后他被列入了哈佛大学成绩优秀毕业生的名单，平均成绩达 B⁺。这种优异成绩的结果是源自他出色的毕业论文。

作为认识家族中的肯尼迪，这些已经足够了。至于家族中的其他成员，比如他的 5 个妹妹和 3 个兄弟也给了他不小的影响，特别是罗伯特·F·肯尼迪是他后来在政府中的主要助手，他担任了肯尼迪政府的司法部长。其他几位：小约瑟夫·P·肯尼迪中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萨福克上空战死；罗斯玛丽·肯尼迪，智力迟钝；凯瑟琳·“基克”·卡文迪什夫人，1948 年死于一次空难事故；尤妮斯·施赖弗夫人，1961~1966 年的和平队队长、1972 年民主党副

总统候选人萨金特·施赖弗的妻子；帕特里夏·劳福德夫人，演员彼得·劳福德的前妻；琼·史密斯夫人；爱德华·M·肯尼迪，联邦议员（1962—），1980年民主党总统提名权的候选人。

综视整个肯尼迪家族，肯尼迪其父对家族及肯尼迪本人的影响最大也最关键。他有着一套培植自己的孩子前赴后继的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谋略。对此，肯尼迪生前就说——也正如上文的提及——自从大哥小约瑟夫死后，踏入政界来填补哥哥空缺的担子就落在他的身上了。假如他日后遭不幸，大弟罗伯特会起而接替，一旦罗伯特死了，二弟爱德华还会接替他。生活的现实是肯尼迪家四个儿子中有三个都死于非命。如肯尼迪所言，父亲的嘱托都真的落在了爱德华身上。但爱德华并不像二哥一样富于能力与运气。他在30岁时当选为参议员后，一直连选连任。虽也在1972年几度当选为总统候选人，但他均未成功。不过，他目前是民主党自由派头面人物。

肯尼迪家有钱有势，在美国政坛上的影响不可小视，可谓“财大气粗”。但肯尼迪一家的悲剧迭出，9个子女遭遇不幸：除老大小约瑟夫1944年8月在英国驾机身亡，老二约翰当上总统不到三年被刺殒命；老三罗斯玛莉是个智力低能，常年在精神病院；老四凯瑟琳1948年5月在法国旅行时死于飞机失事，她的丈夫则在二战中阵亡；老七罗伯特1968年6月在洛杉矶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获得初胜时遇刺身亡；老九爱德华1963年飞机失事，身受重伤。有人对肯尼迪一家

的历史作过如下的评语——“两代富贵，一门悲剧”。看来这话倒也符合事实。

二、从哈佛到海军

约翰·肯尼迪是在纽约布朗克斯维尔一所私立小学毕业后转入康涅狄格州米尔福特的坎特伯雷中学，家庭经济情况的优裕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他学习成绩平平，但对体育运动则有兴趣。毕业时在全班 112 名学生中他名列第 64 名。

1935 年夏，父亲把他送往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他因患黄疸病停学返回美国就医，康复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不久又因黄疸病复发辍学。1936 年，约翰·肯尼迪去了欧洲。不过这只是一次短暂的旅行。除了旅行以外，肯尼迪的心中还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标——考察国际政治动态。1936 年的旅行使他对于国际政治的兴趣与日剧增了。1939 年，肯尼迪又一次欧洲之行中，他借助老乔·肯尼迪当驻英大使的便利之机，做了使馆中的大使秘书。肯尼迪从那时起，同各界人士接触，对当时的欧洲政治有较深的了解。

他的题为《慕尼黑妥协》的毕业论文写得十分出色，自然也受到各方的好评，而他的两次欧洲之行成了论文成功的基础。这也许可以算得上是对于那些给予他的哈佛学业很高评价和寄予很大希望的人的最好回报。在哈佛大学求学时，特别是前两年，他的辅导教师之一，就是后来出任美国大使的加尔布雷斯教授，曾认为他是一个性格开朗、讨人喜欢、傲

慢不羁、面貌漂亮但一点也不用功的学生。然而他以优异的成绩告别哈佛，他的政治学教授阿瑟·霍尔库姆发现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学生，他的天性爱好思索，并喜欢把他的思想付诸行动”。

不错，肯尼迪杰出的毕业论文就是他思索的天性的产物，该文主要分析了英国当时在二战初期采用绥靖政策之原因，就英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缺乏准备，做出条理分明、很受重视的分析。他写信给他的父亲说他在论文上花的工夫“比我有生以来在任何工作上花得都多。”这篇论文后来以《英国为何沉睡》为题作书出版。不少读者对这位年仅23岁的作者的中肯表示赞赏与钦佩。这本书也为年轻的作者赢得了4万美元。这其中的一部分即英国版税被肯尼迪捐赠给了遭到轰炸的英国普利茅斯市。

其实在哈佛，约翰·肯尼迪不仅仅只有这么一些可以为人称道的表现。除了他的论文外，在课外活动中，他绝对是一位活跃分子，并且赢得“明星级”的荣誉与赞赏。肯尼迪在一年级和三年级的校橄榄球队中担任边锋，并且是1938年冠军航海队的成员，他还是游泳队和高尔夫球队的成员，并参加校内的垒球与曲棍球活动。他是哈佛大学《紫红色报》的编辑成员，也是“玉米粥”俱乐部成员。所有这些，都给肯尼迪的哈佛学习生涯添涂精彩的笔画，不仅仅造益于其后的军中生活，恐怕即便提起其在白宫里的岁月，这短短的几年也不可被忽略。

哈佛毕业后的肯尼迪在斯坦福商学院短暂地学习过，然后去了南美洲旅行，在这之后不久，他告诉家人，他决心去

当兵。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约翰·肯尼迪主张美国加强战备以应战患。在他试图加入军队的道路上，肯尼迪受到了阻碍，这个阻止他的障碍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是他在哈佛读书时，玩足球使背部受伤的痼疾，陆军与海军都不接受他。但这个时候，还是他的父亲老肯尼迪帮了他大忙。他对儿子寄与厚望，或者可以说是“委以重任”。他用在政治上施加压力的作法，使肯尼迪在 1941 年 10 月成为美国海军的人员。还取得了海军少尉的军衔。此后不久，他又成为 PT—190 鱼雷快艇的艇长，获得海上指挥权。在太平洋所罗门群岛服役的时候，肯尼迪已经是美国海军的中尉了。

1943 年 8 月 2 日，肯尼迪指挥着自己的舰艇在所罗门群岛外的布莱克利特海峡巡逻完毕后，照例返航。由于发动机开得不太顺当，也没有人守望，结果在新乔治亚岛两面海域遇上日本一艘驱逐舰。疯狂的日舰猛冲过来，一下子把他的鱼雷快艇一劈为二。两名水兵牺牲，肯尼迪上尉及其他艇员被抛入燃烧着汽油的海水中。尽管背部伤痛，但肯尼迪还是带领着 11 名艇员和战友设法游了 4 个小时。在这四个小时里，他们在开阔的海面上前进了好几英里，特别是肯尼迪用牙齿咬住救生衣的带子，把一名严重受伤的艇员拖到安全地点。几天以后，他们漂到奥拉萨那岛，当地的两名土著比乌库·加萨和埃罗尼·库马纳发现了他们。这个时候肯尼迪则发挥了他机智的天份，他用力在椰子壳上刻了一段话，土著帮着把椰子壳转交给盟军人员，于是所有的船员在 8 月 8 日被救。

在以后的几天里，由于他奋不顾身抢救他的战友，由于他的机智、勇敢，由于他与那多年来忍受折磨他的病痛的耐力相一致的勇气，他成了美国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在约翰·赫西为《纽约人》周刊（1944年6月17日）撰写的《幸存》一文中，肯尼迪引起了全国的注意。罗伯特·多诺万的《PT109：约翰·F·肯尼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61年）一书详细报道了这次事件。

这件事使肯尼迪获得一枚紫心勋章以及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勋章。由W.F. 哈尔西海军上将签署嘉奖令。嘉奖令中说：“他的勇气、毅力和卓越领导帮助拯救了几个人的生命，维护了美国海军的最高传统。”

这次磨难加重了肯尼迪背部的伤痛。在海上又经历了几次不幸的遭遇后，肯尼迪回到美国接受手术治疗。1943年2月，他住入医院。在治疗期间，手术又一次使他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疼痛。

在亚利桑那慢慢复原的期间，肯尼迪每天和他父亲在电话上交谈很长时间。这样的长谈使他们父子俩更加亲密了。这个时候，在他父亲的政治计划里，肯尼迪已经取代了他哥哥的位置。这一点从下面一段老肯尼迪的评论中可以得知。老肯尼迪说：“我告诉他，乔死了，因此这是你的责任了。”

约瑟夫·肯尼迪想要他大儿子从政。其实“想要”这词不确切，他是“要求”大儿子从政。杰克不敢肯定政治对他来说是否合适，但是他的父亲对他们二人都抱有信心与热情。1946年他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民主党选区里参加竞选众议员。

三、崭露头角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肯尼迪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当过新闻记者。这份十分体面的工作是其父在赫斯特报系中为他谋得的。肯尼迪在这里的表现同样是出色的，他目光敏锐、精力充沛。该报系赞扬他是“愿意阐明美国水兵观点的鱼雷快艇英雄”。此后在1945年4—6月间，这位年轻的战时英雄为《芝加哥先驱美国人报》采访和报道了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1945年7—8月，他为国际新闻社报道了波茨坦会议和英国战后大选的新闻。在英国时，他敏锐的洞察力也有充分的表现。他曾做出了邱吉尔可能失败的敏锐的观察。他的编辑认为他写的关于英国工党可能获胜的报告荒谬可笑，并且加以改写，预测保守党可能获胜。然而他们却谁也不会料到，肯尼迪的预言是正确的。

1946年初，国会众议员，马萨诸塞州的柯尔利将出任波士顿市市长，在国会中留下了一席空缺。肯尼迪在父亲的鼓励下认为从政机会已经来临。老肯尼迪认为，儿子必须投入民主党的初选，并且了解工人阶级家庭。年轻的受过哈佛教育的肯尼迪，尽管因背部受过伤以及战时发疟疾带来后遗症而行动不变，仍迫不得已去学会他的父辈通过政治渗透所学到的东西。

肯尼迪在竞选中没有利用当地的民主党组织为其拉选票，而是凭借他家庭的经济地位自行组织了一个强大的竞选班子，这个办法效果颇佳。

肯尼迪的全家和朋友都鼎力相助，连十四岁的爱德华也为他跑腿。肯尼迪起初发表竞选演说时，讲得太快，而且缺乏政治风度，加之，他体形消瘦。但在当时，回国的战士深受人们欢迎，因此他就用“好战的保守分子”来自称。这很容易使人特别是使投票人自然地联想起肯尼迪这位战时英雄的经历。老肯尼迪则用一种十分巧妙的办法来宣传这同一内容，他在公共汽车或地铁的每一个空座位上放一册《读者文摘》，上面载有109鱼雷快艇的故事。老肯尼迪的帮助还不仅如此：每一次软弱无力的演说，儿子获得的首先是老肯尼迪的赞美。接下来，就是老肯尼迪指出这位候选人的缺点，这些缺点全部都是老肯尼迪从听众中收集而来的。有了这样的促进与支持，肯尼迪的演讲进步很快。他的兴趣主要在国际政治，竞选众议员只是他将来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一种手段。

在这次众议员竞选中，肯尼迪以42%的选票在十个候选人中名列第一。他在普选中轻易的击败共和党人莱斯特·鲍恩，并连续两次重新当选。

参议员肯尼迪始终不是参议院核心集团的正式成员，也许是因为肯尼迪太年轻、太自由主义、太直言不讳。有这样一件小事：在他担任议员的初期，参加一次全院的辩论时，他离开他的后座向前排靠拢，暂时坐到了参议院中的“老前辈”卡尔·海登身旁。海登四十多年前就已经进入国会了。肯尼迪一贯对历史感兴趣，于是他问参议员海登，在这段时间

内，国会如果有变化的话，到底会是什么变化。海登回答说：“从前新议员是不发言的。”

不过，几乎所有的议员都喜欢他和尊重他。当年肯尼迪在海军服役时第一次被提升时的报告写道：“很乐于工作，工作非常认真。”也许这可以作为议院中一些年长资深议员对肯尼迪的共识。

除此之外，其他民主党的同僚们也十分欣赏他。肯尼迪对于他们请他在捐款宴会上发言或在电视节目中露面总是有求必应的。肯尼迪依然向他在哈佛时一样，很容易结交方方面面的朋友。这些人包括他的亲密友人约翰·谢尔曼·库伯这样的自由派共和党人，也有乔治·斯马瑟斯这样的保守派民主党人。他对院内的辩论所做的贡献，以细致的事实和冷静的逻辑性而受到好评。他甚至在委员会里和在全院的独立投票中被誉为明智、勇敢和克制的“产物”。肯尼迪总是保持适度的自由投票记录，并在住房、教育和劳工委员会任职。他反对《塔夫托——哈特利法》，公开赞成低价出租的公共住宅计划，并支持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他对众议院中的党派组织保持超然态度，并赢得了一个名声：“好似一个攻击传统观念者。”肯尼迪在这一时期表现出来的果敢、坚定与从不牵强附会也许来自其父的作风或者是军中的风格。他对美国军团反对公共住房计划感到愤怒，并痛斥这个历史悠久的退伍军人组织，这种异常坚定和强硬的做法使得该组织的成员大吃一惊。更让他们吃惊的是，肯尼迪敢于在议会中用很响亮的声音说：“自1918年以来，美国军团的领导就从来没有过利于这个国家的建设性想法。”有很多支持者们一再劝说肯

尼迪，然而那时的肯尼迪就像他背上的伤痛一样“顽固”，他的回答是：“拒绝收回这个声明，或者为这个声明不作任何形式的道歉。”

参议员时期的肯尼迪是初出茅庐的肯尼迪，又是崭露头角的肯尼迪。这样的根基成为了他大步迈入政坛中的基础。勇气与知名度更是肯尼迪这一时期的一笔庞大的财富。

四、走入政坛

1952 年，随着艾森豪威尔的大胜，共和党在全国的声势不可挡。但肯尼迪却逆流而上，在这一年中他以 7 万张选票的优势取代在任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由于肯尼迪这一段的经历与其在马州政治生活中的崭露头角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必须重提）。

由于这次当选的票数差距很小，肯尼迪对他的老朋友西奥多·索伦森说：“这个州里任何人都可以走进我这个办公室对我说这次当选是他的功劳。”也正是这个原因，肯尼迪在他 1952 年竞选活动结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其 1956 年竞选活动。在再次竞选正式开始前将近 6 年的时间里，他不容许任何其他问题来分他的心，在这几年中，肯尼迪最厌恶的就是人们认为他会轻易取胜的预测，他认为这正是他最大的敌人。

肯尼迪为其 1958 年获胜采取了五个基本步骤：

1. 与他在本州每个角落用心培育起来的个人组织保持接触。
2. 每年，关于他“为马萨诸塞州多做一些工作”而谋求提出立法和行政行动的详细报告遍寄马萨诸塞州各地。
3. 越来越多地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各州各地去发表演说。他的大部分演说，特别是在小市镇上发表的，都是超党派的，而且口气相当温和。

4. 仔细培养马萨诸塞州各种报纸对他的好感，因为这些报纸大都是共和党的，而且在 1952 年时几乎全部拥护洛奇。记者、编辑和报刊发行人到参议员的办公室去，总是深受欢迎的。报社经理凡是需要一个代言人，或一篇社外人士撰写的社论，或是在某一个与政府有关的问题上需要有人帮忙时，总发现参议员肯尼迪是易于效劳的。结果，同 1952 年形成鲜明的对照，没有一份马萨诸塞州的报纸在 1958 年反对肯尼迪再次当选参议员。几乎所有的报纸，包括一贯充当共和党代言人的波士顿《先驱报》这类报纸，都公开支持他，这恐怕是肯尼迪在 1958 年最感欣慰的了。

5. 参议员不但从来不忘记他的支持者，还经常争取他的反对者。他总是愿意忘掉分歧，宽恕诋毁他的人。他并不记恨，并且认为在政治问题上不应实行报复。他经常提醒共和党人，他同索尔顿斯托尔合作；他支持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政策措施以及他的独立投票记录；他经常使工商界人士知道，他努力繁荣马萨诸塞州经济和制止工会的不法行为；他对参议院“第二胡佛委员会报告”起着领导作用，并且向他们散发他父亲的另一个朋友赫伯特·胡佛的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印本。然而，这些材料他寄给谁呢？他们包括为他同弗科洛的不和而激怒的意裔美国人；因为他支持圣劳伦斯航道而怨恨他的码头工人；被他的劳工改革工作搞得不安的卡车司机和其他工会会员和因为他投票造成陪审团审判问题修正案而对他有所猜忌的黑人……，肯尼迪向这些人强调他为他们的利益所做的工作，他对他们的事业的友好态度以及他对他们领导人的支持。

此外，他保证对一切来信立即答复，对所有的来访者都表示亲切的欢迎，并尽量亲身亲地地处理问题。

如果用“独一无二”这个词来形容肯尼迪在竞选上的许多做法，绝对不过分，也正是这些独一无二的做法，成为他竞选总统成功的重要因素，这套方法在肯尼迪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发挥了作用，而且至关重要。

肯尼迪的一切举动付诸实践之后，接下来“表演”的就是共和党人了。然而共和党人在马萨诸塞中所表现的只是尴尬。因为在1958年竞选到来之际，他们根本找不出一个愿意对抗肯尼迪的重要候选人。

有些共和党战略家建议不反对肯尼迪，以便抑制民主党人对他投票的热潮。波士顿有一家报纸的专栏作家甚至建议两党都支持他。已故的比尔·坎宁安这样说，共和党人“不可能战胜他。他们不能借用一个更好的人，他们肯定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不一致推举他呢”？

结果，不出人所料，约翰·肯尼迪以创纪录的三比一的比率赢得了连续五次的政治胜利。但肯尼迪这次仍制造出了意料外的事情，即他竟然比自己的对手多得了87.3万余张选票。他创造了马萨诸塞州历史上任何一个候选人所未曾赢得的最大优势票和最大总投票数。

然而，一切并未在这里结束，他使民主党的全部候选人同他一起在州内各地赢得了胜利。并使民主党第一次在马州的议会里赢得了多数选票。这个时候，肯尼迪成了马州的奇迹，成了民主党奇迹，或是可以说是全美国的奇迹。

就是在这个时候，肯尼迪走上了他在美国政坛上的真正

坦途。

他先后在政府工作委员会—劳工和公共福利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和联合经济委员会中任职。其在参议员任期之内，肯尼迪更是表现不俗，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开发圣劳伦斯航道的建议提出后，他是唯一站出来举手赞成的马萨诸塞州议员。当人们警告他，这项计划有使外国船舶从波士顿以及其他东海岸港口转往五大湖沿岸内陆城市的危险，但约翰·肯尼迪却不以为然，他举起的手也一直未曾放下。他坚持不变的理由是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

这位“出色”的政治家在坦途中也会有小小弯折和颠簸。关于马萨诸塞州的民权问题可以列为一例。民权问题在马州并不是一个重要的争端，因为反对种族歧视的正义法规和持续不断的种族歧视行为在那里已经相安无事地“和平共处”了多年。虽然如此，肯尼迪当选为众议员和参议员时，都曾参加到两院中拥护民权的小集团中去。

他支持一个强有力的公平就业委员会，支持取消人头税，支持反对私刑的立法，并支持修订关于妨碍议事活动的规则。在来自新英格兰的议员中，他第一个委派一个黑人做他的工作人员。

肯尼迪要求他的助手劳伦森去查清关于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提出的绕过由委员会审议选举权法案的做法是否具有任何法律依据。因为这项法案是他支持行政部门提出的，并且是创先例的。当劳伦森报告说，他从参议院的规划和先例，以及从宪法中都找不到这种根据，而且这会使保守的参议员

们在工作权和众议院的其他法案上要同样的花招时，肯尼迪便支持民权法案应按正常程序送交委员会，并须在一个星期内审议完毕。

其实，这个意见也是受到许多维护民权的民主党人的私下赞同的。大部分人认为放弃了传统程序所引起的厌恶感会使一个强有力的议案再难获得通过。但是在政治上可能被尼克松和共和党人的策略所击败这一点使他们中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地投票支持尼克松的裁定，而唯有肯尼迪一贯坚持用正常程序投票。肯尼迪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受到谴责。在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在波士顿黑人领袖的信件中，在报刊社论和专栏文章里，肯尼迪都受到了攻击。

肯尼迪在不止一篇的演说中曾引用过一首据说是在一个逝世的议员的文件中找到的传奇式诗篇：

“在生命行将熄灭的余烬里，

令我引以为憾的是：

我做“对”了时，没有人会记住，

我做“错”了时，没有人会忘记。”

在肯尼迪平坦的道路上，有两样东西一直伴其左右。一是演讲稿，二是他的著作。

肯尼迪每次讲话，他的工作人员总要事先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在国会图书馆，肯尼迪以借阅参考书多而闻名，他的演讲有点与众不同：首先，他在参议院发表的重要讲话并不像有些比较喜欢讲话的同事那么多；他也不以一篇演说所

受到的宣传来衡量自己或其他人发言的效果。

在肯尼迪的众多演说中，他在1957年概述美国和西方通过谈判最终解决阿尔及利亚自决问题利害关系的那篇不容忽视。这篇演说虽然受到巴黎与华盛顿的批评，但它的很多方面在随后的年代中被证明大部分都说对了。

通常当肯尼迪在参议院发表的一篇演说引起了同反对党的辩论时，肯尼迪所表现的又往往是以往的作风，就是坚定立场。即使攻击他的人是一些资历较老的共和党议员，他也“毫无惧色”，肯尼迪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他的性格“顽固不化，不可救药”，而是因为他认为他的发言并不是什么信口雌黄，更不是言而无据和缺乏逻辑。例如，对于霍默·弗格森为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政策削减陆军实力进行辩护，对于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反对肯尼迪关于增加对印度援助的请求，对于威廉·诺兰以一票之差击败肯尼迪提出的鼓舞波兰民族主义的一个方案，或对于霍默·凯普哈特要求参议院举行秘密会议，以及辩论肯尼迪指责美国战略部队故步自封的许多问题，都是如此。

除了演讲稿以外，肯尼迪在立法、政治、外交政策，经济问题和历史等方面广泛尝试，在他的任期之中开始为杂志写了大量的文章。例如1954年时，他对艾加所著的《联合的代价》一书中的一节发生兴趣。这一节中讲到了约翰·昆西·亚当斯作为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的独立风格。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肯尼迪在其助手的帮助下搜寻到更多的参议员抵抗选民压力的事例，用这些好材料写了一篇有价值的杂志文章。他希望提醒人们，政治是——而且能够是——最崇高的

职业。

在肯尼迪的一生中最值得他高兴的荣誉是1957年获得传记奖“普利策奖”的书作——《勇敢人物的画像》。这本书在1956年1月1日出版时，约翰·肯尼迪不再是“初出茅庐的参议员”了。这本书立即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畅销书，博得了不少好评，并译成几十种文字，从波斯文到古吉拉特文。其中的一章在书出版后不久被改编成为电影剧本。大多数章节均被发行量可观的杂志和报纸予以转载。肯尼迪也因此时常受到一些作品评论午餐会和大学的邀请去发表演讲，然而这样一部成功的力作又是如何写成的呢？

这要从1955年1月说起，当时作者正在棕榈滩他父亲的住宅里卧床休息（他的背部手术使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的生活使他有时无精打采，有时心情烦躁。他的身体的痛苦使他只有从事一种引人入胜的脑力活动才可补偿。通过电话和信件往返商讨，他的《政治上的勇气》一稿的规划制订好了，他很快找到了草稿，送了一份给《哈珀杂志》去考虑，文章暂时定名为《政治勇气的典范》。这时，肯尼迪所想的已经不是满足于一篇成功文章，而是如何把这么多丰富的材料，付之予精髓而成为一本书了。

哈珀对这本书兴趣颇高，源源不断的材料开始送到肯尼迪床边的小桌子上。肯尼迪每天写稿直接用电话指示他的助手——把书给他送去，起草一些备忘录，查对资料来源以及搜集种种材料。二百多本书籍、期刊、杂志、《国会记录》和旧的报纸，还有其他的一些信件和资料成为他成稿前广泛阅

读的东西。肯尼迪坚持要了解每一章的全部历史背景。这使得他不仅仅感到了著书的成就感，而更重要的是他在心理历程上的前进。他每向前走一步，就对自己的政治哲学以及在民主政治中一个担任公职的人的职责，产生了较过去更深刻的见解。

除了绪言与尾声外，大部分手稿在6月1日他回到议院前都已经完成了。几箱子的书，大部分都是国会图书馆的财产，从棕榈滩运到了华盛顿。他的写作并未结束，仍然是日以继夜的继续工作。最后，他选定了《勇敢人物的画像》作为这部心血之作的名字。

肯尼迪成功，不仅仅依靠其家族的富有、个人曲折而丰富的人生经历，或是聪颖睿智的天资，还有一点，在这里，我们也许感受得到——是他自我完善的勤奋。

他的财富，他的天资以及他的勤奋构成了肯尼迪者的成功，铺就了肯尼迪式的坦途。

五、白宫逐鹿

肯尼迪向白宫进军的活动开始于 1956 年。他这一举动并非是在一时间突然动念而采取的。对于这一点，他后来的助手索伦森这样看：这个愿望并非他在某一时刻突然动念的。它并非一桩压倒一切其他兴趣而使他着迷的事。它既不是从他哥哥那里继承来的，也不完全是他父亲强加给他的，或在病中所激起的想法。他对参议员的生涯并不满意，也不是为了权力而醉心于权力，更不是为了自己而需要什么荣誉。要是他始终得不到那个职位，他也不会感到上当受骗和灰心丧气。而且在 1956 年那些使他有赢得这个职位的可能性的事情发生之前，他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提上他的时间表或就此制订计划。他竞选这个职位并不是由于认为自己是在体现祖国的命运，也不是他对于未来有着某种宏伟的计划。

1956 年初，约翰·肯尼迪对这个职位还没有明确的意图时，他曾对一个新闻记者说，“我料想凡是搞政治的人都想当总统。”他想当总统无非就是这个因素——还因为，正如他在 1960 年经常说的，“这个职位是行动的中心，是美国制度的主要动力和力量源泉”——也因为，正如他在 1962 年所说的，“你至少有机会对好些问题能有所作为……对这些问题，我作为一个父亲或者一个公民，都会十分关心的……而且，如果你的所作所为是有益而成功的话，那末，这本身是一件极大

的快事。”

这样的看法可以说是最贴切，最客观的，也是一种最令人满意的分析。

有的美国人把美国总统这个职位称为“世界上最坏的工作。”而肯尼迪的回答却是说：“这些问题总还是需要有人来解决的。”肯尼迪面对这个往往“要求苛刻”的职位，充满自信，他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判断力和勇气，对公共事务的学识，对于自己在参众两院的多年经验，在世界各地旅行的经历，以及在他同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政府首脑的交谈中，都体现了自己的自信心。肯尼迪曾十分坦率地说：“担子是重的……这个职位是要有人去干的。我是考虑去担任这个职务的四、五名候选者之一。我认为我能胜任这个职务，我是以这样的认识来争取它的。”

肯尼迪是如何看待“考虑去担任这职务的四、五名候选者”中的另外几个的呢？他更坦率地认为这些人的才干充其量也并不胜过他。至于在其他可能竞选的人中，他认为约翰逊最有才干。而塞明顿则是各派最可能一致投票支持的人选。他对这两位都有好感，也都很尊重。

对于共和党的对手，肯尼迪认为他们也不是不能击败的。他于1957年写道，理查德·尼克松将是一位“顽强、老练、精明的对手。……想打败尼克松先生，要采取比漫骂性的声明——就是他在乘车参加1961年总统就职游行时可以看到的那类声明——更进一步的手段。”但这还不是肯尼迪对尼克松看法的全部。除上面所说的以外，他觉得用“志大才疏”这

个词形容尼克松十分合适，其次还有尼克松的演说风度和过去的历史都被肯尼迪认为不可能激发起选民的信心。

肯尼迪视这些为自己的有利条件，他对这些有利条件的认识不是自视过高，而是客观事实。当然同时，肯尼迪看到更多的也看得很重要的是他的不利条件。他知道宗教问题是他一个十分致命的不利条件。当时，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一个天主教徒当上总统，教皇的部队将在大西洋底下挖一个通道，以便在密西西比流域建立一个新的梵蒂冈城，因为罗马太拥挤了。还有其他一些说法：耶稣会会士将在白宫内悬挂深红色帷幔，购置能俯视西点军校和首都华盛顿的战略土地，以及在美钞上刻印念珠等等。这一类说法出自比较早期的美国历史时期。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这个比较宽容的时代，也有一个典型的流传于美国的笑话：自由女神像将改名为“港口圣母马利亚”。肯尼迪认为在他争取总统职位的最初，人们会在这个笑话中来考虑是否要投他一票的。

肯尼迪认为除了宗教之外，年龄问题对他也是不利的。因为在这以前，从来没有人四十三岁成为美国总统。四十三岁的外表对于当时美国总统这个职位来看，的确是有些过于年轻了。

但这些不利的因素正如他所努力的初衷一样并未阻止他的竞选目标。

肯尼迪力图把这两个不利条件转为其用。他反复提及宗教问题，用甚至使无偏见的人也处于守势这样的方式提出这一宗教偏见问题，仿佛出于任何理由投他一张反对票反而会导致被传播媒介认为是个偏执者。至于年龄，虽然会引起某

些人的不信任，却也使他同大多数政客有所区别，并有助于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

因此，从当时的形势、事态和肯尼迪自身的竞争本能来看，当时没什么可以阻止他参加1960年的总统竞选了。而且下定决心的肯尼迪感到要不就在1960年，否则就永不再参加竞选。很多人都曾劝他等一等，这些人包括专栏作家、竞争对手、朋友和素不相识的人。1960年的一天，当他在威斯康星州欧克莱尔市的街上进行竞选活动时，同他握手的一个老妇人说：“现在还没到时候，小伙子，现在还太早，还太早。”他和颜悦色，几乎是逗趣的回答说：“不，大娘，是时候啦，现在正是时候。”于是，老妇人含笑地走开了，说了一句“愿上帝保佑你。”

1960年1月2日，星期天，正午十二时三十分，参议员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大步走进了一个坐满了人的记者招待会，宣读了关于他参加竞选总统的一份声明。

他当时四十二岁——还从来没有这么年轻的候选人当选过美国总统。甚至在此之前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也从未提名过这样年轻的候选人；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信仰这个教的教徒从来没有被人认真地从中考虑过人选；他是合众国参议员——参议院原来只有一个共和党人的总统，而民主党人甚至在这一百年中从未没有提名过一个参议员当总统候选人。

然而肯尼迪的一举一动毫不气馁。他从牙买加休假归来，晒得黑黑的，说话干脆而自信：

“今天，我宣布我参加竞选美国总统。……在过去的三年零四个月里，我访问了联邦每一个州，并和各界的民主党人交谈过。因此，我参加竞选是以这一信念为基础的：即我能在提名和大选中获得胜利。”

他知道，在这个声明里，他不能忸忸怩怩，或半心半意。他应当使全国各地拥护他的人都知道，他在竞选中将是有始有终的，不会使他们进退两难。不久即将承担起义务来的政界领袖们需要弄清楚，他是否准备认真地大干一番。他决定不直接提到他的宗教信仰，但是却毫无敌意的回答了这方面的全部问题。在答复人们担心他太年轻的问题时，他强调谈了自己“几乎到过世界上每一洲、每一国”的20年旅游经历，“为美国效劳出力的18年，先是在太平洋充当一个海军军官……¹⁴年来一直是国会的议员。”他从不直接地或贬低地谈论其他潜在的候选人——他们中只有约弗莱已经公开宣布参加竞选——只不过要求他们在预选中同他较量一番。

肯尼迪的第一次较量是在这一年的四月初，在威斯康星，对手就是明尼苏达的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该州的选民知道关于肯尼迪和109鱼雷快艇的情况，也听到过他全家友好的演说。肯尼迪的部下也把反对天主教的印刷品邮寄给威斯康星的天主教徒，这是一种手段，使人想起柯利市长在马萨诸塞州竞选州长运动，那时候那些支持者企图煽动天主教徒投票，仿效三K党在俯视波士顿的小山上焚烧十字架。肯尼迪出资购买了一架“卡罗琳”号飞机，这使肯尼迪比汉弗莱更具有机动性。

可是，肯尼迪在威斯康星州的胜利并不是决定性的，因

为就全国整体来说，该州的天主教徒人数在比例上是较大的。在西弗吉尼亚，肯尼迪和汉弗莱都照例进行竞选活动。汉弗莱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大作文章，他列举在大萧条时期同贫困作斗争的经历以及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美好”回忆，以此来争取选民的支持。他常常站在罗斯福巨幅画像的前面发表演讲。

肯尼迪向选民许诺要建设一条州际公路，以带动一种更活跃的经济。肯尼迪获得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帮助，是他成功的一招儿。罗斯福的声音极其宏亮，犹似他的父亲，使人感到亲爱的总统声音犹在。选民即对今天的候选人——肯尼迪产生共鸣，也许并不是由于意见一致，而是上层阶级的英俊的肯尼迪——正如罗斯福一样——所能展示的从容而充满信心的态度以及领导者的许诺。

然而，正像我们可以想象的那样，竞选活动有时候沦为卑劣的行径。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向汉弗莱提出疑问：为什么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服役？这位明尼苏达的参议员实际上由于医学的原因而被拒绝入伍。加上肯尼迪的资金又在滚滚流动。好几年来，钱不断流入乐于接受的西弗吉尼亚民主党人的竞选活动。据说，1960年向行政司法长官们提供的现金据说平均为1000美元。肯尼迪的金钱也对该州复杂的候选人名单上候选人姓名的位置作了安排。

正如，哈里·杜鲁门后来详述的，“肯尼迪每件事都考虑到，对每件事都花钱。”但给肯尼迪带来麻烦的，还是宗教问题。这个问题成为投在他竞选光明面上的阴影。由于天主教信仰，早期的投票数落在后面，使候选人大为吃惊。肯尼迪

的态度是八个字：直接面对，加以利用。肯尼迪说：“民主党人要的是一个总统，而不是一个原则。”

肯尼迪并不把所有怀疑天主教徒能否当选的民主党人看作是顽固分子。他并没有召唤人们来共同反对不让天主教徒进入白宫的禁令。他并不急切地想为他的祖辈在波士顿遭到的歧视复仇。他对于可能成为第一个天主教徒总统会带来的不论何种荣誉也并不感兴趣。他只是想成为一个总统，而他恰恰又是一个天主教徒。1960年，他在一封信中写到：

现在的问题是，有多少人将投票支持肯尼迪，他除去其他条件外，还是一个天主教徒。一旦我们卷入一场……关于存在什么天主教徒的辩论中去，那么我们就的确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了。

因此，他一再说他不希望任何人根据宗教信仰这个因素来决定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不希望这个毫不相干的标准成为他能否获胜的原因。

在竞选的过程中，有人曾指控说他威胁民主党如果不提他的名的话，他将利用天主教选民来进行报复。而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做。肯尼迪既没有这种愿望，也没有这种力量把天主教徒选民的热情作为一件武器来使用。

肯尼迪在演讲时，提到他在退伍军人医院中呆了两年，从来没有人对他的宗教产生疑问；在他哥哥前往德国执行任务而阵亡之前，也从来没有人对他的宗教表示疑问。他的助手索伦森告诉他说，“把问题说清楚，你是受害者……受偏见之

害，你要一直用被动语调这样说，‘我被称为’……‘有人提出’……‘人们被告知去投我的反对票，因为……等等。”汉弗莱的支持者，当有几次他们的候选人出场时，便奏起新教的奋兴布道会的歌曲，如《还我旧时信仰》。汉弗莱在号召全州的神父支持肯尼迪，否则的话，他也许会大发牢骚。

肯尼迪已经很成功的把自己较年轻的这一不利因素转变成了一个有利因素。在洛杉矶，他出席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业已就绪。当肯尼迪返回科德角，而他的助手索伦森在五天内第三次横越全国时，鲍勃·肯尼迪和肯尼迪的工作班子正在比尔特摩饭店内的总部里最后落实各个事项的细节问题。有关住宿、运输、通讯、旅行、接待代表、公共关系等方面和许多别的事情的具体安排，几个月来从未间断。

在关键的阶段，塞格林的宣传机器也开足马力，每天都发布新闻消息，每天都向新闻界宣布新增加的支持者的名单：例如像北卡罗来纳州当选州长桑福德，明尼苏达州的弗里曼、新泽西州的代表等。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志愿工作者——如马萨诸塞州的代表，有闲的旁观者，肯尼迪的老朋友——都被分配任务去同 54 个代表团膳宿在一起。他们的任务也十分清楚，就是按时向肯尼迪报告这些代表们的情绪、问题和倾向，特别是关注他们投票的情况。肯尼迪有着每个代表的档案卡片，这些卡片被有序的保存在肯尼迪的“控制室”中。肯尼迪的接待室中挤满了人群；许多俊俏的姑娘忙着分发附有竞选徽章的免费咖啡，并放映一部介绍肯尼迪的影片。

肯尼迪能否在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提名，其实很大的一个有利条件还没有被提到。而说到这个有利条件的

出现又不得不提到罗斯福。他在 1936 年废除了“提名者必须受到三分之二的选票”的规定。若不是这样的举动使民主党变得从此自由化的话，肯尼迪是决不会获得提名的。这一点，肯尼迪本人也再清楚不过，因为他知道，1912 年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钱普·克拉克和 1924 年的威廉·麦卡杜，在大会刚开始时都受到普遍多数代表之拥护，结果却没有得到提名。

肯尼迪于 7 月 9 日星期六抵达洛杉矶，受到 2000 名表示友好祝愿者的欢迎。随后，他在《会见报界》的电视节目中以平和的态度说道：“我认为我们将赢得提名，但是我并不认为大局已定……”。

代表大会于 7 月 11 日星期一开幕。在这次正式的角逐中。肯尼迪的两个“最出色”的对手是约翰逊与史蒂文森。

约翰逊的支持者十分活跃。在参议会休会至 8 月间的这段时间内，多数党领袖约翰逊同意其支持者的要求，正式宣布参加提名竞选。但约翰逊并不赞同肯尼迪和反天主教的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思的观点。他还曾以警告的口吻说，“罪恶的努力……对于无辜的人是毫无怜悯之心的，对于无经验的人更不会格外照顾的。”雷伯思攻击肯尼迪的领导地位“没有经过考验”；约翰·康纳利和印第安·爱德华兹对肯尼迪体力上能否胜任总统之职表示怀疑。更有一些老资格的政客故意谈论着可能会出现的一种僵局：由于史蒂文森夺走了肯尼迪的一些选票，所有总统候选人就都继续处于竞争状态，那么在经过两轮投票肯尼迪的票数减少后，约翰逊，或者史蒂文森，将作为妥协的人选。有人企图修改代表大会规则，以防止候选人的报名在第一轮选举中就可以解决掉。这项决议

显然是针对肯尼迪的，显然是为了阻止肯尼迪被提名而提出的，但未获通过。

尽管有约翰逊和赛顿明这样的挑战。但是自从“三分之二”的规则被废除以来，没有一届民主党代表大会曾出现过僵局的局面。别的人只抱有获胜的希望，但肯尼迪却实际拥有大量支持他的代表——这就是区别所在。

在会上，推举史蒂文森的声势也愈来愈大，这就又提出一个新问题。罗斯福夫人表示希望肯尼迪的“大公无私与敢作敢为”会使他本人同意担任副总统的职位。因为在这个位子上，他会得到“成长与学习”。这显然附和了沃尔特·李普曼早些时候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提出的主张。她还说，黑人是绝不会投肯尼迪的票的。休伯特·汉弗莱在西弗吉尼亚州预选后一直对肯尼迪很友好，不过始终没有承担过义务，从未向任何人任何媒体正式宣称自己是支持肯尼迪的。这时，他终于摆明了立场，但却是说，出于对“国家的关注”，他决定从支持肯尼迪“转而”支持史蒂文森。帕特·布朗发现，原先他以为能为肯尼迪拉到手的加利福尼亚的选票，已经被史蒂文森拉走了。然而，这其中有何原因呢？一个哥伦比亚特区的，愿属汉弗莱一方的代表说，她受到来自史蒂文森支持者方面严重而持续的压力，而这些人正是抱怨肯尼迪实施高压政策的那帮家伙。代表大会的走廊里挤满了支持史蒂文森的南加利福尼亚人和他们的纠察，他们在那里吵吵嚷嚷地欢迎他们的“英雄”作为一名代表低达会议大厅。

至于史蒂文森本人曾被要求支持肯尼迪的提名，一些和他们两人都关系良好的人一再要求停止这些拉票的努力，因

为这样的行动只会帮了别人的忙，他们要求结束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以取得肯尼迪的尊重，及支持肯尼迪的提名，作为对 1956 年肯尼迪支持他提名的报答。但史蒂文森却婉言回绝。实际上已经欲有一搏了。

尽管，肯尼迪的对手搞了很多麻烦和名堂。但肯尼迪——这位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的阵脚却丝毫不乱。他清楚，凡是赢得提名的候选人员要被人指责是“采取高压手段”、“哗众取宠”和“讨好拉拢”的。谣言、混乱和暴徒式的情绪之类的东西，就如同管弦乐队、气球、标语牌和演讲一样，构成了大会的内容的一部分。然而代表大会上真正重要的事情则在于争取 761 名代表的选票，即在 1520 票总数中超过半数。

实际上，转而支持史蒂文森和约翰逊的代表人物比所宣传的要少得多。无论是会场里支持史蒂文森的观众，还是会场外支持史蒂文森的纠察队员都代表不了美国人民的大多数，而只是代表少数罢了。

史蒂文森和约翰逊都可能提出由肯尼迪作为他们的竞选伙伴，但肯尼迪对此都毫不手软的给予断然拒绝。肯尼迪所采取的不是简单的口头的声明，而是在电视上真的这样做了。他对一个猜测史蒂文森——肯尼迪联合竞选的记者说：“来！我可以回答你，倘若我与谁搭档接受副总统提名的话，我就把我明年的参议员薪金给你。”他的父亲表达了肯尼迪班子的看法：“我们决不会为胜负、金钱或留个芳名而接受二把手的位置。”

主要的问题仍然是 761 张选票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在第一轮投票结束时就扭转局势，否则，就等到第二

轮投票了。如果，第二轮投票必须进行的话，又最令肯尼迪担心的是那些受法律限制而只能投票一次的人帮不了他的忙，结果，失去的票还不足以抵偿从别人那里争取来的选票。但是，如果有必要搞第三轮或第四轮投票的话，一种僵持局面就可能導致幕后的妥协。

星期三下午，每位候选人的报告和表态工作正在进行之中，肯尼迪的最后一项工作是要求明尼苏达州州长奥维尔·弗里曼为他作主要提名演说。弗里曼是个适合上电视屏幕的、强有力的发言人，他是中西部人，农场主的好友，自由派新教徒，一州之长，肯尼迪希望在这个州里能从史蒂文森与汉费莱手中拉走选票，弗里曼具有一切必需的品质。这一决定耽搁了很长时间才做出。现在演说与亮相就要结束，而众目睽睽的重要时刻即将来临。

上午的十时零七分唱票。肯尼迪以 806 票在第一次投票中获胜。而他的对手中只有约翰逊得了 409 票。

约翰·肯尼迪在接受提名时所作的演说中许诺要有一个“新边疆”。这个词也许采用自家庭图书馆藏书的一本书名。这本书的作者是盖伊·艾默森，出版于 1920 年。这本书赞扬美国民主的资源与前途。艾默森在书中写道：“美国主义意味着男男女女生来就是取之于国家要少于投入国家的。”肯尼迪在发表就职演说时说：“不要问祖国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们能为祖国做些什么。”这些演说很少暗示肯尼迪脑海中有些什么计划。关于他的对手理查德·尼克松，他说：“同一个对每个问题每个方面都谈到了并且投过票的人进行竞选，我们知道

并非易事。”

肯尼迪获得提名后的第一件事是，通过他的四条专用电话线中一条打了个电话给妻子杰奎琳。杰奎琳当时呆在海恩尼斯港，等待小约翰的出生。紧接着，他就赶到大会会场，向围着他的家人和政治上的主要支持者简短致词，表示感谢。然后，肯尼迪返回寓所，吃了几个鸡蛋，睡了一觉。接下来，就是挑选竞选伙伴的问题了。

遴选得 409 票面位居第二的林登·约翰逊为副总统候选人使一些同代人为之吃惊。正是这个原因，诺曼·梅勒把肯尼迪描述为一个年青教授并且满不在乎的超然于自己的候选人角色。用这位美国作家的话说，约翰逊是“一头政治动物，他的呼吸像一头动物，流汗像一头动物……他的脑子完全沉浸在一系列政治事实与政治手腕之中。”约翰逊的竞选火车（也被记者们称呼为玉米饼专车）胜利地周游过南方景色和文化风光。约翰逊称自己是“一个南部联邦军的孙儿。”他掌握了每一个细节：他的讲台的高度、他演讲结束时要奏《得克萨斯的黄玫瑰》乐曲，他一说“再见”，火车就要开动等等。

因此，一个新闻记者学他的讲话与声调说，“上帝保佑你，洛基斯顿。”“我但愿能留下来同你一口一口地喝上几杯，发发牢骚……”。《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个记者拍电回去说：“一个狗养的将获得南方多数票。”这是旧时风格，是一个民主党人或者一个南方新政拥护者的风格，是一个消失了的可是仍具有魅力的乡村时代的回声。

无论怎样，肯尼迪还是选择了约翰逊作为他忠实而实力不凡的竞选伙伴。因此，包括罗伯特·肯尼迪在内的很多人

看到肯尼迪突然提出和接受约翰逊时，都为之愕然。

肯尼迪对于这样一个角色的选拔有着自己的想法。他曾对一个采访者概括的谈起过他所需要的竞选伙伴的素质。他说：“我认为他应该有能力履行总统的职责……我认为他应该是一位对美国各种问题，特别农场事务很有经验的人……他是一个中部或西部的人。”

肯尼迪所挑选的人必然不是一个过于开明的、过于保守的、过于不善言谈的、为党内某些派别所十分讨厌的，或者其长处、短处与他本身过于相像的以及过于年轻的那些人。林登·B·约翰逊是一个既没有上述不合格条件，又具有许多合格条件的人。

尽管对约翰逊竞选总统的支持只具有地区性的性质。但他本人不仅仅是一个南方人，他更是一个全国性的人物。他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多数党领袖，也是一位在过去的八年国会工作中比艾森豪威尔还有建树的参议员。他对农业和西部当然并不陌生，在肯尼迪没有影响的一些地区，约翰逊却有很大号召力。他的协助对于肯尼迪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再者，大多数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高超的政治家，特别是在南方的农业地区。肯尼迪以艳羡的目光把约翰逊看作是“江轮赌徒”，一个穿着褶边的黑上衣的高个子得克萨斯人，身带手枪，手中握有王牌，颇有风度的在19世纪密西西比河上汽船的客厅里踱步而过。他的老练成熟与肯尼迪的蓬勃生气配合很好，同时他那得克萨斯州穷人的贫穷背景同肯尼迪的上层阶级出身和举止互为补充。

挑选约翰逊当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公布了。这次提名未

采用以往规定的办法，而是口头表决，掌声通过。这样便打破了一个先例：历史上第一次由两名现任参议员担任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

余下的事就只有准备接受提名的演说一事了。约翰·肯尼迪在这个演说中许诺要有一个“新边疆”。“新边疆”政策包括以下内容：

- 为了重建本党内的团结，肯尼迪向约翰逊、赛明顿、史蒂文森与杜鲁门伸出橄榄枝。他说“由于他们又站在了我一边，我感到安全了。”

- 努力减轻反天主教人士的疑虑。他说：“民主党……信任美国人民也信任他们有作出自由、公平判断之能力——信任我有作出自由、公平判断的能力。”

- 对尼克松的攻击。有些人反对这样做。后来这一段竟然是演说中最易遭到批评家攻击的一部分，但肯尼迪考虑到电视观众人数众多，认为演说中应包含这些内容。

- 对无党派人士发生超党派呼吁。他说：“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诅咒黑暗，而是为了点燃光明。……我是在向不论年龄大小而且充满朝气的人发出号召，在向不论属何党派而精神坚定的人发出号召。”

- 叙述美国国内国外面临的问题。

但这篇演说最精彩的一部分是肯尼迪对“新边疆”的总结，演说中的许多思想和不少语言取自其他人的稿子和肯尼迪早期的演说。关于“新边疆”，他说：

不是总结出我打算提供给美国人民的東西，而且总结出

我打算要求他们提供的东西。这是在向他们的自豪感而不是在向他们的钱色发出呼吁；他呼吁美国人承诺作出更多牺牲而不是要求更多的安全。……“新边疆”已是既成事实——未知的科学空间领域，未解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和尚无答案的贫困与过剩的课题。

他说，美国人民站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面临着一项抉择。不仅仅在两个人或是两个党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安乐之间，在民族的伟大坚强和民族的没落衰微之间，在进步的清新空气和“按部就班”的陈腐、阴湿的空气之间抉择。

在一次对于这次会议说来未免过于宽敞的露天会场里，在夕阳朝着一度是肯尼迪的最后边界缓缓西沉的时候，这位获得提名的民主党候选人，以充满信念和决心之气势发表了他的这次演说：

全人类都在等待着我们的决定。全世界都在期待着，想看看我们如何行动。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我们不能不去尝试一下。……请你伸出手来帮助我，请你们发表意见并投我的票。

六、总统候选人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足足的让肯尼迪及其竞选队伍大忙了一番，而正如肯尼迪所愿的是，他们所得到的不仅是得胜时候的喜悦，还有更重要的是继续“战斗”下去的丰富经验和排除万难的前进勇气。

1960 年的总统竞选活动对肯尼迪来说，是以低调开始的。这样的作法是出于肯尼迪明智的考虑。

当时的民主党人四分五裂，疲惫不堪。他的获得提名使党内业已动摇不定的南方派十分恼火。他选中约翰逊为竞选伙伴的决定则使本来疑虑重重且“不好应付”的自由派也十分恼火。农场主对肯尼迪显然是抱有怀疑态度的。同样，劳工对约翰逊也表示怀疑的态度，而黑人则对两个候选人都表示不信任。拥护史蒂文森的死硬派抱怨肯尼迪的野心、财富、父亲、兄弟以及他拒绝就任命史蒂文森为国务卿一事的表态。另一方面，老道的尼克松作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人得到了洛克菲勒和戈德华特的支持，而且尼克松的竞选伙伴洛奇又无疑是个颇具实力的人物，这样，他已经发表了一篇出色的接受提名的演说把追随者成功地集结在一起。

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此时还远不比尼克松知名，因为尼克松担任过全国性的职务和参加过四次全国性竞选。同时，在测验中，大家认为肯尼迪还在经验方面逊于尼克松。在全

国范围内，人们知道肯尼迪更多的主要是：他是一个富有的、缺少经验的年轻天主教徒。在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刚刚结束时，民意测验表明尼克松以 50% 对 44% 的比数稳稳的领先，还有百分之六的未定数。

所谓民主党的“正常”多数是由南方的绝大多数选民——这时由于宗教和民权问题态度不明朗——和决定大选结果的美国其余地区动摇不定的派别所构成的。

艾森豪威尔已经使民主党在北方的据点形成了选举共和党人当总统的习惯。而更有很多州像纽约、新泽西、密执安和宾夕法尼亚等关键的选区。自从 1944 年罗斯福当选以后，在全国选举中就一直未使民主党人更倾向于同时投几个党的票，或根本不投本党的候选人，甚至还有一部分就根本不投票。

正如由于民主党的各类观点如此纷纭，致使一些独立的国会议员能够在各自的地区获胜，但在全国性大选中就未必十分走运了。

与此相反，共和党则正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他们控制着行政部门，掌握着用人、宣传和分配公款的全部权力。他们可以从大捐款人那里得到较多的一部分捐赠。艾森豪威尔的声誉和稳健更助了尼克松一臂之力，成为尼克松一笔不可忽视的财富，而且他在这几年中的表面和平与繁荣的景象也颇为引人注目。实际上，观察家们还想起有哪一个通过选举执政的政党能享有如此广泛的好评。

有的行家们甚至认为，根据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考验来看，即使抛开肯尼迪没有先例的宗教和年龄问题不谈，他似乎仍

然会被击败。

另一方面，尼克松本人比共和党本身更受人爱戴，而且也远比攻击他的对手所描述的要能干和受人欢迎。他头脑冷静、思想敏捷、口齿伶俐，具有广泛的竞选经验和丰富的电视演说知识。他有一个效率高的组织和私人班子来领导他那团结一致和经费充足的党。他还能利用整个行政部门进行调查。他的竞选伙伴洛奇在全国远比约翰逊有名，而且在当时与肯尼迪也可能是不分上下。

肯尼迪虽然赢得了新闻界的很大支持，而且这些新闻记者在报道竞选活动时给予他很大支持与帮助，但是美国的报刊编辑和发行人们绝大多数是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的，在拥护肯尼迪的不到六分之一的报刊编辑之中，许多人原是拥护肯尼迪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对手史蒂文森或其他人的，他们对于竞选给予的多数是不大热心或者过分迟到的赞同。

最突出的例子是《纽约时报》。但是肯尼迪由于注意到这份极有影响的《纽约时报》自1944年以后就没有拥护过一个民主党人当总统这一事实，所以对于该报支持他的编辑还是感到很满意的。

1960年夏末秋初的另一件事更为引人注目。这就是赫鲁晓夫访问联合国，这件事突出报道了尼克松自称的“同赫鲁晓夫分庭抗礼”的优越的经历。这便使选民们想起尼克松在美国的厨房展览会上同赫鲁晓夫的辩论。当时，还不大知名的肯尼迪需要全国的注意，这事占去了报纸的头版新闻位置。

从这些看来，似乎尼克松注定要成为新任的美国总统了，但如果谁真的这么想，那就可能太武断和缺乏判断能力了，因

为尼克松这些优势是在肯尼迪采取他真正的竞选活动之前充分表现的，而且在这个阶段肯尼迪也还未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在参加过三次众议员选举、两次参议员选举和七次总统预选都取得成功后，肯尼迪已经懂得了如何竞选，他已经有足够经验在选民们面前表现自己和在对手的面前保护自己。

肯尼迪的竞选活动是繁杂而有序的。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肯尼迪偕同妻子和女儿在海恩尼斯港休息两天后，就埋头与罗伯特等人（包括他的参谋人员），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他们和约翰逊开了战略会议，和灰心失望的民主党人开了团结会议，同史蒂文森和鲍尔斯开了政策会议。肯尼迪还在国内做了一些急促的旅行。例如，他先去海德公园访问了埃里诺、罗斯福，又到独立城去访问哈里·杜鲁门，恳请他们的支持，肯尼迪的这些行动是以他充足的精力，饱满的热情为本钱的。

从纽约到佛罗里达，又从佛罗里达到加利福尼亚，民主党内长期不和的各派虽然没有统一起来，但却比以前协调了。尽管那时正处夏季休憩时节，还是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并且是十分全面的选民登记运动，他强调要和千百万没有登记的选民进行个人接触，以便在许多州争取比肯尼迪的最高指标更多的新的选民来投民主党人的票，肯尼迪说：“从现在起到11月，你们每人去登记上一个人，这样你们实际上等于投了两次票。”

肯尼迪为他的夏季别墅修了一道新围墙，并派驻了警察，以隔开川流不息的游客，正是从这里，他们发出了一册册宣

传品，他们把尼克松同艾森豪威尔的不得人心的农业部长本森作了类比。由于老的民主党联盟已经整顿一新，党的代表大会新创伤也已经愈合。有关民族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和农业问题的发言人以及劳工领袖和自由派领域都纷纷前来海恩尼斯海港，肯尼迪的竞选准备工作就已经就绪了。

人人都看到，肯尼迪正在为接近和实现他的夙愿而全力以赴了。

现在的肯尼迪已经知道怎样最有效的运用各种现代化的工具——空中旅行、电视、先遣人员，智囊团，民意测验等等。他更加熟悉的掌握了一门本领，那就是在一场高度个人的，然而涉及一些有争论的重大问题的竞选运动中，应当怎样唤起群众和号召群众。在预选中，肯尼迪就采用了他在马萨诸塞州用过的基本方法并加以改进。在竞选活动，他把这些方法进一步地发展了。

筹募经费是肯尼迪面临现实的一大难题。捐赠大笔款子的人主要是拥护尼克松的，而捐赠小款子的人又认为肯尼迪的财富使他们的捐赠显得无足轻重。

共和党人准备承担——而且是承担了——超过 1952 年与 1956 年为艾森豪威尔竞选所花费用的水平，肯尼迪缺乏他们那样的收入来源，但是又需要同样的竞选财力，他准备承担——而且是承担了——美国政治史上最大的竞选赤字。而他的党在全国竞选中都花了 1000 万以上的美元，成了名副其实的“美元总统”。肯尼迪后来有一次谈到他的竞选班子时说：“他们花起钱来，就好像我们肯定会赢一样。”到民主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他的竞选费用已经超过赠款 20 多万美元。

会后，肯尼迪接受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时，又承袭了大约 7 万美元的债务。到 1961 年 1 月 1 日，他就任总统时，民主党的内债已经上升至 400 万美元。不过，不管怎样，肯尼迪在这个问题上最终还是顺利过关。

到了这一年的 8 月份，本来就不迷人的尼克松又交了坏运气。他因肌肉受伤而感染，从 8 月底至 9 月初这关键的近两周时间内，他躺在沃尔特·里德医院里，接受抗菌治疗。而此前尼克松的工作并不是向肯尼迪那样务实和有效，尼克松在竞选活动开始时许诺在每个州发表讲演。然后他“愚蠢”地履行了诺言去遍访各州，在阿拉斯加和其他一些民主党人根本无法获胜的州里浪费了时间，他本应用这些时间去访问中西部的，而原来可以在竞选中为尼克松多添几票的 5 月份的与赫鲁晓夫举行的首脑会议，因一架 U—2 型美国侦察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而吹掉了。使事情更糟的是，虽然尼克松声称自己作为历史上最积极的副总统，具有出色的政府管理经验，但艾森豪威尔总统在 8 月随口作的评论破坏了尼克松的这种想法。一名记者要艾森豪威尔列出尼克松作为副总统曾参与过的重大决定，艾森豪威尔答道：“如果给我一周时间，我或许能想出一个来。”

与此同时，肯尼迪正在着手准备去应付宗教问题。他和他的助手们很清楚的知道宗教问题并没有消失。肯尼迪说：“这是一件一直使人感兴趣的事。我们在西弗吉尼亚所做的就是防止它成为唯一的争端……但是……这个问题会再度出现的。”

尼克松自己的牧师在 9 月 7 日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全国

争取宗教自由公民大会”，果然这个问题成了头号问题。这个机构经过反复地商议后发表了一份声明，他们向肯尼迪提出了一连串质询，从宗教立场上谴责肯尼迪，这也许为这位民主党候选人争取了选票，因为全国有很多人把选举看作是彻底驱走政治上的反天主教信仰。

9月，肯尼迪直接向大休斯敦牧师协会发表关于宗教问题的演说。在此期间，他与助手们花了整个周末的时间，其后在埃尔帕索又搞了一个通宵来起草这个讲稿。肯尼迪希望把自己的立场说得异常清楚而全面，使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都决不会对他恪守宪法的态度有所怀疑。

他在9月12日星期一晚上出席了这次在得克萨斯的牧师协会讨论宗教问题。讨论会的地点是在休斯敦赖斯大饭店的舞厅，由于这次会议将通过电视向得克萨斯全州播出，人人都待在自己的岗位上静候会议开始，肯尼迪穿了一套黑色衣服，打了一条黑领带，有点紧张地坐在讲台后面主持会议的两名牧师当中。从另一面注视着他的，是休斯敦的新教牧师。在参加会议之前，有人曾告诉肯尼迪：“这些新教牧师因为仅对一个天主教徒被人们称作顽固派的这件事已经使他们厌恶了。”当时在座的还有一大批前来参加这场重大对抗的全国性报刊的权威评论家。会议的气氛显得紧张、敌对。几分钟的等待似乎是漫长的。

最后，主持人把肯尼迪介绍给了大家，气氛马上就缓和下来。这次演说是他竞选演说中最好的一篇，而且是他一生中最重要演说之一。只有他的就职演说可以说是在气势和修辞方面超过了它。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对于他为自己的信

念作出简明总结叫好，“问题不在于我信奉的什么宗教，因为这只有对我个人才是重要的事情；问题在于我所信奉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美国。”他还说：“我信奉的是一个政教绝对分离的美国——在这里，没有哪一个天主教教长会命令总统假如他是一个天主教徒的话，怎样行事，也没有哪一个新教牧师会命令他的教区居民去投谁的票……在这里，宗教自由具有如此的不可分割性，以致反对一个教会的行为就被看作是反对所有教会的行为”。

休斯敦的较量没有结束掉宗教方面的论战，也没有使议论参议员的人沉默下去，不过不仅在休斯敦赖斯饭店舞厅里，而且在整个得克萨斯州和全国各地，它都受到广泛而热烈的赞扬。这次较量使肯尼迪没有必要进一步再做出任何全面的答复，也使得他把不利转为有利，争取到了较大的优势。肯尼迪虽然仍然继续答复询问，但再也不想提起这个问题了，这场较量提供了一份文件，它对任何通情达理的人所能提出的全部问题都作了答复。它有助于把正当的关心肯尼迪的观点的公民和从他出生伊始就谴责他的狂热分子区分开来，在会议结束之后，众议院民主党领袖萨姆·雷伯恩激动的说：“他们把他们啃得够呛！这个年青家伙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

此后的肯尼迪更加积极努力，他把他的竞选活动变成了花钱所能买到的最成功的竞选活动，他充分运用了当时能获得的与选民会面的一切技巧。民主党人对选民情绪反复作了细致的抽样调查，发现尼克松（而不是肯尼迪）受到妇女投票者更大的欢迎，还发现外交事务是民主党候选人最大的弱点。戴维·伯纳在他的书中写到：“肯尼迪的顾问们极力主张

他摆出一副对付共产主义的强硬姿态，特别在尼克松进行辩论的时候。肯尼迪在电视上严厉的批评尼克松听取卡斯特罗把古巴拉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将古巴‘丧失’给共产主义。

尼克松最大的错误是接受了4次广播电视辩论。当时，肯尼迪认识到，他在竞选中最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用别的事情来转移人们对他的宗教信仰问题的视线，他在45个州的500多次演讲，记者招待会和发表的声明对此都有帮助。但肯尼迪还是不够满意，因为这些演讲，记者招待会上的观众即使场场爆满，合计起来也只有所有选民中的极小的一个部分，解决的办法就是利用电视。

无论是尼克松还是肯尼迪在电视上都有过出色的表现。

1946的一场辩论中尼克松击败了一个能干的众议员并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当时他借助他的爱犬的名字“切克斯”来回答人们对他在经济上有不端行为的指控。这次“切克斯演说”普遍被认为是把他送上副总统宝座的那次竞选活动中最巧妙地运用电视的一次。后来在1960年，他也干得很好，当时他在莫斯科同尼基塔·赫鲁晓夫进行“厨房辩论”，这次即席的辩论提高了他在民意测验中受欢迎的百分比。

但是，尼克松也是一位有才能的辩论家。他在1952年同洛奇的辩论，在西弗吉尼亚州与本党的汉弗莱的辩论以及在洛杉矶代表大会上与约翰逊的辩论，都获得很好的成绩。

8月间，当提名竞选结束之后，全国性的无线电视——电视联播网不惜牺牲几百万美元的代价，而且不顾无数大为不满的紧张喜剧与西部作品的爱好者的抱怨，在较早的时候便

提出免费让两大政党的候选人一起走到台上去辩论。

联播公司又立即提出了一项具体的建议，肯尼迪马上接受了，并对尼克松直率地提出挑战。像所有的共和党人一样，艾森豪威尔劝尼克松同肯尼迪辩论。因为，尼克松在全国各地远比他的对手知名。他被认为是较为成熟和富有经验的，他没有理由去帮助肯尼迪集结起观众来。

但是尼克松是要维护他那几次“风光”的荣誉的。由于自信能够击败肯尼迪，由于希望通过辩论去影响他需要其选票的几百万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据说还由于注意到免费电视广播的经济上利益，并考虑到两党的全国主席已经暗示两位候选人为了公众的利益应当接受邀请，尼克松也感到要体面的退缩是不可能的。

当肯尼迪发出挑战 4 天后，使他感到惊奇和高兴的是，副总统接受了。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决定连续举行 4 次电视广播辩论，每次 1 小时，由所有的电视网和无线电网同时联播。这 4 次辩论，特别是第一次，对于选举结果有决定性作用。

4 次电视辩论的时间分别是 9 月 26 日，10 月 7 日，14 日和 21 日。估计有 1 亿 500 万人观看了其中至少一次辩论，而极为重要的第一次辩论，因为它确定对两位候选人的感受，吸引观众为最多，多达 7,000 万人。

两位候选人在观众们面前所展示的形象，对比起来，尼克松已经先输了几分。在这场形象之间的冲突中，他的表现在欠缺，肯尼迪看来精神饱满，泰然自若；尼克松却因在医院中减轻了体重，显得形容憔悴，脸色苍白，态度险恶；肯

尼迪则肤色黝黑，身体健康，临阵不惊。

其实，肯尼迪获胜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认识到，这场林肯和道格拉斯以来最有历史意义的辩论必然会产生空前的影响，而且必然会有 1000 万以上的观众观看。他唯一的希望是自己可以为此作好充分的准备和获得充分的情报。为了这个目标，在第一次辩论之前，肯尼迪花了大量时间来探讨国内每一个问题的事实和数字，研究肯尼迪的每一项指责和尼克松的每一项反指责，并把得到的材料压缩而制成卡片。他和他的智囊团进行模拟的演练，他让助手们提出所能料及的一切棘手和敏感的问题。有时会议是在他下榻的芝加哥旅馆的阳光灿烂的屋顶上召开的，有时会议是在他的起居室召开的，最后一次是他在一张堆满档案卡片的床上安然地午睡了将近 3 个小时后在他的卧室里举行的。某种意义上说，他通过和新闻记者、大学听众、电视讨论会等等的几百次快速的答辩会议，已经为这个时候准备了好几年。

有人记录了肯尼迪参加这次辩论的情况。

“在他换衣服的时候，他把自己紧张心情比作一个即将走入麦迪逊花园广场拳击场的职业拳击家的心情。对此，戴夫·鲍尔斯回答说：“不，参议员，这比较像世界棒球锦标赛开幕式上的投手，因为你一定要赢得这 4 次辩论。”

在乘车去电视台时，他没有说话，有点紧张。一个助手就怎样在电视上讲话所提的陈腐的意见被他直率地打断了。路上的交通灯也使他恼火。在广播室里，他派戴夫·鲍尔斯回旅馆去拿一件蓝色的衬衣，又看了一遍自己的笔记本，随便将本子丢在一边，由电视台人员为他稍微化了一下妆。由

于他一直晒得很黑，加上那天在旅馆屋顶上又晒了一下，因此不需要多上妆。他和尼克松紧张不安地互相微笑了一下，寒暄两句后，便呆坐着等到晚上 8 点 30 分。

肯尼迪首先起来发言，他讲得平静，直率，不过语速有些过快。但这一番讲话字字有力，语句简短而锐利。他所选择的题目和用语都是他在竞选的最初几周里所熟悉的：

“我认为摆在美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在尽可能的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呢……？如果我们失败了，自由也就失败了。……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我们所取得的进展并不满意……”

“我并不满意”，他继续说下去，“因为我们的钢铁生产能力有 50% 没有利用，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在工业国家中为最低，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粮食在仓库腐烂，而几百万人却忍饥挨饿，……学校学生过多，教师待遇太低，比苏联培养的人才少两倍……自然资源没有开发；由于种族歧视，那么多美国人的才能浪费掉了……”他结束他的开场白时的那种绝对的信心在全国各地的电视屏幕上都可以轻易感觉出来。

在结束语中，参议员肯尼迪起先简短地答复了剩下的几项指责，后来几乎完全把尼克松撇在了一旁。他们辩论开始以来，双方都曾表现出的那种高度热情地直接与观众讲话：“……只有你们才能决定……你们要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你们要对将来做些什么事情。我认为我们已经为采取行动作好了准备。”尼克松的结束语听起来内容空洞，处于守势。当肯尼迪仍然保持着主动，信心十足的讲完时，尼克松蹙起了眉头。

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根据辩论的论点，这次交锋似乎是平局，詹姆斯·赖斯顿第二天写道，第一次辩论“并没有使两个总统候选人中的哪一个得势或失势”。报纸的大标题大多数全把这次辩论称为平局。但平局对于肯尼迪来说就是得分，因为它证明，他已控制了所辩论的问题，也控制了更有经验的对手，现在已经有许许多多的选民知道肯尼迪了，而且是在赞许的态度中知道的。抱怀疑态度和持有异议的民主党人全团结到这边来了，震惊的共和党人再也不能说他不成熟和无经验了，新教徒也不再是把肯尼迪只当作一个天主教徒了。

太多的人有这么一种印象：肯尼迪永远是面向观众讲话的，而尼克松则对观众置之不理，就简直像赫伯特·胡佛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之间的一场竞争。尼克松使人想起了憔悴而疲倦的胡佛的形象——一个对克服大萧条无能为力的胡佛；充满希望的肯尼迪使人回忆起活泼开朗的罗斯福。

观看电视辩论的 7000 万美国人中大多数的意见是，肯尼迪大概已经赢了。肯尼迪发现有许多人都认为一切全都不错，拥护他的群众的人数与热情大为增长。尼克松的新闻秘书不得不发布了一条消息，大意是说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身体极佳，精神很好”。肯尼迪收到了先前态度暧昧的南方民主党州长们热烈祝贺他的一份电报，他们一共九个人。他们在霍特斯普林斯举行的会议上观看了这场辩论。共和党的政客们团团围住尼克松让他健康点，说话强硬点。俄亥俄州的保守派参议员弗兰克·劳希决定加入肯尼迪的队伍。早在代表大会之前就一直表现冷淡的民主党人——包括史蒂文森

的支持者，大城市的党魁们，尤其是新教徒——全开始为肯尼迪效劳了。

上述状况同肯尼迪保持的自信气氛是一致的，在竞选活动的最后阶段越来越向肯尼迪逼近时，如果说他和以前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更沉着了。

关于民权问题，肯尼迪手下的选举专家告诫说，如果他要从小黑人那里赢得像过去民主党候选人通常赢得的同样多的选票的话，他就需要作出更为积极的呼吁。因此在9月，他开始赞许的提到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在餐馆前发生的静坐抗议，还提到需要普遍的让黑人平等的使用公众设施。他要许下诺言发布一项政令，禁止在政府出资建造的住房上实行种族隔离。随后，肯尼迪又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10月，民权运动领袖小马丁·路德金牧师在亚特兰大的一次静坐示威中逮捕，被判在佐治亚州一所监狱里服苦役6个月。肯尼迪为提高自己在黑人中的声望，他十分同情地打电话给金夫人科雷塔，表示慰问和关怀，并提出愿意提供帮助。同时，他的弟弟罗伯特又打电话给法官，说服他同意交纳保释金。此后不久，这位民权运动领袖的父亲，老马丁·路德金牧师发表声明说，他曾打算投尼克松的票，但现在已转为投民主党候选人的票了。因为“杰克·肯尼迪具有支持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的道德勇气”。

除民权问题之外，肯尼迪的沉着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当他大发忧国之情时，他迸发出无比的信心。他的演说更为奔放，更为协调、更为幽默，而且不那么紧张了，他依然是随随便便、自由自在、毫不胆怯，保持着他的本色。他此后演

说一般都言之有物、直截了当、具体明确、给人一种关切与自信的感觉，显得十分了解情况，不屑于蛊惑人心，还有一种冷静而果断的领袖气度；这些演说显得自信，但决不是妄自尊大的；他战胜了疲劳，他的声带在最后一轮竞赛中又发挥了威力。

尼克松进行了有效的招架以后，使用了以往辩论中从未用过的粗野的字眼。他加强了他的指责，说肯尼迪是左翼劳工头头的俘虏，必然使美国陷入通货膨胀与经济萧条……，肯尼迪冷静处之，他在布朗克斯说：“在过去的七天中，他骂我是蠢材，说谎者，骗子手等等。我只限于称他是一个共和党人……而他却说那些话，真算得很卑鄙了。

肯尼迪把最后两周时间集中在伊利诺斯州密执安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和新英格兰等地。

11月7日晚，是选举的前夜，肯尼迪参加在老家波士顿花园的一场由他最早的支持者们组织的聚会，他说：

“我很感谢你们过去对我的支持。我要求你们明天和我们站在一起。而更重要的是，我要求你们在尚未到来的明天永远和我们站在一起，一起建设美国，推动美国，使我们这个国家振作，把它送进60年代。”

选举日首先传来的消息说，参加投票的人创下纪录，将近有6900万选民，这是个好消息，然而，接着告知肯尼迪的就是个坏消息了。信奉新教的南方人特别多；还有除了费城、芝加哥、纽约和洛杉矶外，其他大城市中参加投票的选民低于通常的水平。

第二天早晨9时左右，他的助手索伦森立即上楼祝贺他

即将当选为总统。“加利福尼亚情况怎样？”这是他的第一句话，索伦森告诉他——结果与原来的估计不一致——他已经拿下了加利福尼亚州，而且，不管怎样，他也已经拿下了明尼苏达州、密执安州、伊利诺斯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和密苏里州，这就保证他将获得多数选票，然而结果还未最后确定，选票间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最后的将近 6900 万张选票中，其差额下降到不到 12 万张，这同他在选举团中的 303 票对 219 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刚过正午，最后结果出现了：在选民票中，肯尼迪得 34 227 096 张，占 49.7%；尼克松得 34 108 456 张，占 49.5%。随后，当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认输和祝贺的礼节性电报终于打来时，肯尼迪才忙碌起来，考虑他对各方面的答复和获胜后的声明。他获得自己长期追逐的总统职位时的得意之感，被极度的疲乏，眼前的重任以及得来不易的险胜冲淡了。

这是 76 年以来票数最接近的一次，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来说，正是因为这种险胜扩大了肯尼迪胜利的基础。如果他不是既获得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选票，又获得了新教徒的选票，那么约翰·肯尼迪就不会当选为总统的。实际上，投他票的新教徒比拥护他的天主教徒和犹太人两者的总和还要多。如果没有黑人和南方的支持，他也不会当选的，如果他得不到农场主和商人、青年人和老年人、富人和穷人、城市和郊区的选票，他是不会得胜的，千百万不属于任何派别的一般“公民”，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信念而不受任何压力进行投票的美国人！他们都选约翰·肯尼迪为美国的总统。

就这样，经过几年来的酝酿，积蓄，奋斗和最后的拼搏，肯尼迪如愿以偿地成为了白宫的主人。

七、入主白宫

1960 年 11 月 9 日，刚过了晌午，约翰·杰茨菲拉德·肯尼迪成了美国的当选总统。当时离他上任只有 72 天了，在这 72 天中，肯尼迪最想的就能长时间的美美地睡上一觉，能够安静地生活一段时间和在阳光下松散松散。他还希望跟妻子、女儿以及不久将出世的婴儿一起过一段宁静的生活。

但肯尼迪知道，这 72 天时间是绝对不允许他这样做的，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事正在等着他去做。

……在这 72 天里，他要组成一个政府，搭好白宫的工作班子，任命大约 75 个重要的内阁成员和制订政策的成员，以及对 600 个其他重要任命进行提名，还要决定留用哪些现任官员，对忠于他的人授予官职，并确定将来的人事政策……

……在这 72 天里，他要跟艾森豪威尔一起工作，以便有秩序地交接权力；他要跟尼克松共同工作，以便恢复国家的团结；他要跟民主党领袖们一起工作，以便重新改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要跟自己的助手们一同工作，以便处理过渡时的一切行政问题——包括财政、交通运输、膳宿供应，同新闻界的关系等问题以及处理来自国家首脑、祝愿者、求职者、老朋友和无数其他人士的大量来信……

……在这 72 天里，要为就职典礼制定种种计划，对其中有关的人和事都要考虑到，不能有所疏忽；要商定好一个适

当的继任者接替他在参议院的席位；要出售或转让他所拥有的股票以避免发生利益方面的冲突；并且，还要拟一份就职演说稿……

……在这 72 天里，要为在他就职之前召开的国会的组织工作制订计划；要准备一份可立即列入咨文和法案中去的立法纲领，还有美国的各项问题，包括外交的和内政的，制定出具体的政策和计划，因为这些问题都是他作为总统即将负责和处理的。

这些问题，数量之多，性质之复杂，换了别人很可能会被搞得头昏脑胀。

对于肯尼迪来说，72 天的时间是短促的，不过他并非事事都要从头做起，当然也并非单打独斗，一切工作在他的掌握中显得凌而不乱，井井有条。

竞选结束后的第二天，他即任命特迪·索伦森为他的特别顾问，皮埃尔·塞林格为他的新闻秘书，以及肯尼迪·奥康奈为他的助理秘书，负责安排各种约会。像 43 岁的肯尼迪本人一样，他们都是年轻人。索伦森 32 岁，年龄最小。他们以精明的政治设计家称号而闻名，像大多数总统的助手一样，他们是真正精明的暂时凑成的班子，但是他们自己的工作带来了在华盛顿奉职的丰富经验。塞林格或许是这一班人中影响最小的一个，但是他劝说肯尼迪在电视台上举行记者招待会，以便与公众直接接触，虽然肯尼迪总是同新闻记者们相处得很好，但当他回答他们的问题时，他往往从记者头上看过去，眼睛盯着电视摄像机。美国人民通过这些记者招待会听到和看到肯尼迪的机会比听到和看到其他任何总统的机

会都多，而肯尼迪的知识和机智都显示出较高的水平。在他总统任期内，他受人欢迎的程度从未低于 59%，这主要是由于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为了准备这样的会议，塞林格不断向肯尼迪提供一系列关于政府事务的信息，这有助于他通晓最新的事务情况。

肯尼迪尽可能地挑选了许多新的工作人员。在外交政策事务方面，他向华尔街意志坚强的罗伯特·洛维特和华盛顿律师克拉克·克利福德等人征求意见。由于他接近报界，像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沃尔特·李普曼等新闻记者很容易见到肯尼迪。这些人士大多数性情保守，肯尼迪的很多任命都反映了他们的意见，这使自由派人士感到恼火，来自南方的温和派，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是肯尼迪挑选的一位沉着的行政官员，因而肯尼迪能自己确定外交政策。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新任命的福特汽车公司总裁，试图调整五角大楼的结构。一位记者曾经说，这位重视成本效益的经理（一度为哈佛商学院的教师）“真的是在跑而不是在走”，甚至是“在自动扶梯上跑上跑下”。肯尼迪挑选华尔街的共和党人道格拉斯·狄龙为财政部长，挑选保守党的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赫勒是一个自由派人士，他赞成减税或者增加国内开支，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

自由派人士很少获得高级职位，因为对于肯尼迪来说，他们太热衷于空想、太热心、太感情用事、太喜欢说空话，以及太不敏感了。艾德莱·史蒂文森被调去纽约市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切斯特·鲍尔斯，在肯尼迪活动分子看来，善于说教、优柔寡断而且习惯于作详细解释和进行争辩，这也

许与他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前出版者的身份有关，因而只当了一年副国务卿。虽然他坚持并很有主见地主张政策上向左转，但是他沉着的举止同肯尼迪干脆的风格合不来，这显然给他带来了麻烦。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担任白宫的顾问，还为纪念被害的总统写了一本巨著《一千天》，该书在肯尼迪死后 20 天后就出版了。

肯尼迪还任命了几名可信任的中间派分子加入其内部，其中奥维尔·弗里曼主持农业部，该部对肯尼迪家族来说是所有领域中最神秘的一个部。

罗伯特·肯尼迪必须要找一个合适的位置，于是当上了司法部长，这也正如老乔·肯尼迪之愿。这一任命很恰当——而且是不折不扣的裙带关系。哈佛大学的麦乔治·邦迪和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沃尔特·罗斯托成为白宫重要的外交政策顾问，他们两个人也许可以称得上是强硬路线的自由派人士，甚至肯尼迪也觉得罗斯托有些急躁莽撞，称他为“空军元帅”，因为他倾向于主张用轰炸来解决海外复杂的麻烦问题，但罗斯托也主张和平竞赛，而且他强调发展经济，再加上其强硬态度，进步主义以及信赖专门知识，这可能终于形成肯尼迪圈内人士对外政策方面的风格。

从一开始，这个新政府就侧重于对外政策。在这一个世纪里，使总统更多地了解世界大事，这一直是正常的，虽然并非不可避免，则与肯尼迪和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出现密切相关。

肯尼迪除了努力在权力过渡时期做好“交接班”的一切工作，同时还抽时间去了一次波士顿，其目的之一就是向马

萨诸塞州告别。

作为一名政治家，肯尼迪没有忘记他之所以能从事政治生涯应归功于自己出生的那个州。作为当选总统，肯尼迪没有忘记，他不能像马萨诸塞州以他为自豪那样，把整个州的所有政治家都引以为荣。在美国，没有几个州的政府有着廉洁记录，但是在1961年1月震惊他的家乡州的政府官员不道德行为接二连三地被揭发出来，而没有几个州政府有比这种情况更为严重的记录。当选总统感到既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也不能为这个问题发表一篇自以为公正的演说。

肯尼迪和他的助手只有很少时间去准备演说。为了满足肯尼迪的要求，他的助手们不得不勉强从为总统就职演说汇集的词句中去挑几句。稿子不长，只有三十多句话。但它是肯尼迪最精彩的演说之一。事实也证明，这是一篇很动人的演说。这是他当选后发表的第一篇正式讲话。当他把政府说成是“一座小山上的一个城市”时，所有的电视观众都认为他看起来和听起来像一位总统：

.....

对谁赋予多，对谁要求也多。在未来的某一天，当历史的高级法庭审判我们每个人，审查我们在短短的任期内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时……我们的成就……将根据对下列四个问题的答复来衡量：

首先，我们真是勇敢的人吗……？

其次，我们真是果断的人吗……？

第三，我们真是正直的人吗……？

最后，我们真是具有奉献精神的人吗？

我这个马萨诸塞州之子，希望在上帝的庇佑下能使这些品质成为我们政府办事的特征。

同经常紧张的气氛大不相同的是，制订一个新的总统政纲的工作正在悄悄进行。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工作。自 1933 年以后，还没有一个民主党人像肯尼迪一样接替共和党人的总统职位，这次接任是史无前例的。换了别的总统，他可能会等着就职，而后像 1953 年一样，搞个什么研究小组，以便赢得时间和考虑问题。肯尼迪所关心的是要确定有哪些未了的事务要办，安排些什么，并且在 1961 年头几个月里把它们摆在美国人面前。要做到这一点，努力将是巨大的。

一月初，肯尼迪施政纲领制定工作正在顺利进行着，一些主要的职位也已经决定了人选。这时，当选总统的注意力就越来越多的转向就职典礼的准备工作了。他对于庆祝总统就职的音乐会和同时举行的 5 个舞会的计划，对于长达 4 小时的总统就职典礼的游行计划，对于民主党人为筹集百万美元基金而组织的总统就职庆祝会，以及对于所有其他庆祝活动都是兴致勃勃的。尽管由于大风雪，总统就职庆祝会推迟了两小时，但他还是极为欣赏。

同时，肯尼迪开始准备他的就职演说，他需要来自每个人的建议，要求写得简短，并集中谈对外政策。他不要演说带有党派色彩、调子低沉或对前任有所非议，他既不要沿用关于“共产主义威胁”之类的冷战词汇，也不要任何可能会使赫鲁晓夫含糊的话。而且，他要求这篇演说给即将开始的年代定下一个调子来。

肯尼迪的演讲稿从来没有经过那么多次修改，每段话都

要一再润色、增补或删除。在就职的前一天，他的讲稿完成了。这篇演说稿是1905年以来最短的一篇，从头至尾只有不到1900字。

.....

肯尼迪在发表演说之前，罗伯特·弗罗斯特试图朗诵他为这次就职典礼写的几行诗句，弗罗斯特从阿默斯特大学赶来，肯尼迪原来曾在该校发表过关于外交政策咄咄逼人的演说，弗罗斯特朗诵的诗不仅适合这位好勇斗狠的诗人本人，而且也适合肯尼迪在竞选演说中表明的新政府的要旨。

当时虽然阳江和白雪刺眼，使得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老眼难以看清稿子朗诵一篇新的献辞。他就念了几句话代替他的诗：“……一个充满诗意和力量的黄色时代——今天中午就是开始时刻……”

肯尼迪的就职演说自始至终都是雄伟的的调子：

“让朋友和敌人都能听见我在此时此刻的讲话：火炬已经传给新一代美国人，这一代人诞生于本世纪，经过战斗的锻炼，得到过艰难而痛苦的和平的磨练，为我们悠久的传统感到自豪……

“让每一个国家都知道——无论它是希望我们繁荣还是希望我们衰亡——为了确保自由的存在与凯旋，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

“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上，在自由岌岌可危的时刻，只有少数几代人被授予保卫自由的任务，我决不会推卸这一责任——我欢迎这一责任。我不相信，我们中间有人愿意与其他

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代人交换位置。我们为这种努力所奉献的精力、信念与忠诚，将照亮我们的国家和一切为之效劳的人，而这种火焰发出的光芒定能照亮全世界……”

这些讲词暂且不说它的根基是否稳固，它的内容是否积极或是言论是否有据，但讲词所体现的意义本身是符合当时美国人的信念的。特迪起草了这篇演说稿的大部分，他提出了一句现在已为人们所熟悉的劝勉名言。“因此，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祖国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要问你们能为祖国做些什么”（尽管并不是第一次提出）。尽管这些文字大家现在都已经很熟悉，但它们仍然带着措词的庄严性。

就职演讲是一篇优美的文章，它的风格远远胜过政治演说的标准，比早期的朗朗上口的文体更清脆，与 20 世纪美国松散、诙谐的政治演说相比，它是又坚定又尖锐，就职演说也设法使人想起过去的总统：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民主党众议院长萨姆·雷伯恩称这篇演说是 1864 年林肯发表演说以来最佳的演说。

这个时候，肯尼迪真正地成为了白宫的新主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事比那批被挑选来跟他一起工作的人更能使这位新总统感到高兴了，在离自己就职日期仅仅 72 天时，肯尼迪着手拟了一份全新的政府人员名单，当 1960—1961 年大规模搜罗人才的工作于 11 月 10 日开始时，他的选择并不受到任何明确的政治义务式竞选诺言的限制，在此后的五个星期里选定了肯尼迪正式内阁的 10 名部长，至少可以从 5 个方面反映出并没有受到任何方面的限制：

1. 肯尼迪内阁里没有一个阁员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自身

的追随者。肯尼迪绕过史蒂文森、鲍尔斯等全国知名人物而选定迪安·腊斯克为国务卿。在国防部长的位子上，他也同样如此。

2. 肯尼迪内阁只有一个阁员曾经为 1960 年竞选捐过 1000 美元或更多些的钱。道格拉斯·狄龙同他的妻子一起，捐了 26000 多美元，不过是捐给尼克松和共和党人的，而不是给肯尼迪的。

3. 肯尼迪内阁里没有安插他需要安抚的某一反对派中持不同政见的代言人，在其内阁中，阁员具有各种各样背景，并向他提供各种独立的判断，而他们都一致愿为他以及广大公众利益献身。

4. 肯尼迪内阁中只有一个罗斯福、杜鲁门时代的官员——迪安腊斯克。他曾任副国务卿帮办，肯尼迪也并没有致力在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取得平衡。

5. 就民主党历届总统来看，肯尼迪在非党派政治和两党政治方面的特别风格，不同寻常。

总之，肯尼迪需要一个个人的班子——一个能体现他个人方式、方法、目的的班子——去为他对那些创见与建议进行概括与分析；对不同机构之间相互冲突的观点加以斟酌；对于他必须作出决定的一些问题予以阐明并协助在这些问题上添上他个人看法；要确保现实的政治事实没有遭到忽视，并使他能根据自己的各种考虑和选民的意見统筹兼顾地作出决定，而这是任何内阁无需顾及的。

八、白宫的女主人

肯尼迪直到 36 岁才结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结婚的目的是看婚姻能否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并增加他的政治资本。

肯尼迪和他的妻子杰奎琳 1951 年在一次晚会上由《查塔努加时报》驻华盛顿记者查尔斯·巴特利介绍首次相识，当时肯尼迪 34 岁，是一名众议员，杰奎琳 22 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杰奎琳出身于一个属于纽约社交界名流的法商天主教徒家族，其父约翰·布维尔第三是一位证券经纪人，非常溺爱他的两个女儿。杰奎琳从小就是在富有、高雅的环境中长大的。13 岁那年，母亲珍妮特与父亲离婚，杰奎琳和妹妹被判给了母亲，这使她幼小的心灵受到震撼。不久，珍妮特又带着两个女儿嫁给了银行家休·奥金克洛斯。1947 年杰奎琳第一次参加社交界活动时，曾被报纸评为当年初登社会舞台的皇后。她先后在高雅的瓦萨学院、法国巴黎大学上学，1951 年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华盛顿时先驱报》任专栏文字兼摄影记者。

肯尼迪和杰奎琳认识后，不时一起外出，但起初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兴趣。肯尼迪在第一次见面后甚至懒得给杰奎琳打电话。杰奎琳也未把肯尼迪放在心上，几天后就和妹妹一起去欧洲作长时间旅行，临走时连一声再见也没说。从欧洲

回来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才又和肯尼迪见面。当他们开始交往时，通常也是偶然性的。

但1953年1月肯尼迪就任参议员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那个他月他与杰奎琳一起参加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就职舞会，并邀请她出席了国会的开幕式。从那以后他们不断见面，肯尼迪希望赢得杰奎琳的爱情。他现在深深懂得，美国选民只愿意把总统职务交给有家室的人，为了实现政治抱负，必须结婚成家。杰奎琳具备了他寻求的婚姻对象的条件。她妩媚、沉着、高雅、机智，与他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来自两个杰出的东部上流家族——布维尔家族和奥金克洛斯家族。

到1953年初春他们交往将近两年时，杰奎琳显然爱上了肯尼迪，并且决心得到他。雷德·费伊在描述这对男女在一起的情景时说：“尽管她十分老练，但还是不能掩饰她对杰克的爱慕……当我们用餐和谈话时，杰奎琳不时抚摸杰克的手臂，十分愉快地谈他们以后的婚事，她一会儿笑，一会儿唱。她干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在相爱时和她的恋人在一起时要干的一切。”杰奎琳以前似乎喜欢和出身名门的男人交往，对他们的人格、智力和年龄则不闻不问，肯尼迪和她曾接触的其他几个男人有很大不同，他是她认真交往的第一位有力量、有胆识的年轻人。

1953年6月23日，《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在头版刊出杰奎琳与肯尼迪的订婚喜讯，标题为“我们的摄影女郎和约翰·肯尼迪的罗曼史”。

但就在离举行婚礼只剩几个星期，筹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肯尼迪却突然同一个朋友一起去欧洲旅行了一个月之

久，把婚礼的事留给了杰奎琳，这使她大为吃惊。肯尼迪永远不能离开他的朋友和家人，因此他和杰奎琳很少单独在一起，在婚后，杰奎琳也总有一种被遗忘的感觉。

在婚礼前一天举行的单身汉宴会上，24 岁的新娘开玩笑地告诉大家，肯尼迪作为一名求婚者是如何的不合格。他在整个求爱过程中显然没有写过一封求爱信，只从百慕大发了一张无价值的明信片。杰奎琳举起给大家看，上面写道：“希望你来此——杰克”。

1953 年 9 月 12 日，肯尼迪和杰奎琳在罗得岛新港的圣玛丽亚大教堂举行了引起全国瞩目的婚礼，有大约 800 人出席，其中有许多名流和记者。波士顿红衣大主教理查德·库欣主持了仪式，他宣读了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对他们结婚的特别祝词。婚礼后，在奥金克洛斯的农场举行了盛大的婚宴，有 1200 人参加。肯尼迪夫妇的新婚之夜是在纽约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度过的，他们前往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度过了蜜月。

结婚一年后，肯尼迪因背疾住院动手术，由于手术非常危险，肯尼迪一度达到死亡的边缘，杰奎琳焦急万分，她悉心地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几乎未离丈夫一步。肯尼迪终于挺了过来，到 1954 年底，他的病情好转。在休养期间，他在助手们的协助下撰写了《勇敢者的画像》。肯尼迪把这本获得普利策奖的书题献给杰奎琳，这是他偶尔表露出对妻子的感情。

1957 年 11 月杰奎琳剖腹产下女儿卡罗琳。女儿的诞生为肯尼迪夫妇带来了乐趣，也带来了责任。杰奎琳把很大的

精力用在抚育卡罗琳上。在1960年11月8日的大选中，肯尼迪当选总统。11月25日，杰奎琳又剖腹生下儿子小约翰。这是杰奎琳成为白宮女主人的序曲。

这位白宮新女主人年轻、漂亮、文雅、威严、高贵、兴趣广泛、知识渊博，她以其独有的魅力征服了美国。杰奎琳的风格是始终与普通人保持着一定距离，把自己置于精英阵营，她靠保持冷漠——冷漠中又有迷人的神韵和自信——比她同群众掺合在一起更能激起人们的兴趣。她似乎掌握了不可思议的诀窍，使全国都着了迷。许多报纸都起劲地吹捧她，公众则狂热地崇拜她。她的发型、服装和爱好都是人们效仿的对象。杰奎琳的影响还波及到国外。1961年春她随丈夫出访，其出色表现使欧洲人为之倾倒。她国色天香、雍容华贵，服饰入时高雅，操一口流利漂亮的法语和西班牙语，连素来挑剔的巴黎上流社会也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的名声甚至超过了丈夫。在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幽默地自我介绍说：“我就是陪杰奎琳·肯尼迪来巴黎的那个男人。”她迷疯了一些国家的首脑，迅速名闻世界，成为许多国家女性崇拜的偶像。

她一搬进白宮，就发现那里的装饰极差，缺乏艺术气氛，她决心利用自己丰富的艺术知识和强烈的历史观念，使白宮成为美国艺术和历史的橱窗。取得丈夫的支持后，杰奎琳便率人在仓库中寻找出许多被人遗忘而又极具历史意义的家具、瓷器和雕像，并说服富翁们捐赠出他们的古董，聘请专家进行指导，并成立了白宮美术委员会和白宮历史协会，设立了白宮博物馆馆长职位。她还亲自编写了第一本《白宮历

史指南》。1962年2月16日，杰奎琳在全国电视上一小时的特别节目中向观众介绍了装饰后的白宫，大约5600万人看到她在白宫各处走动，介绍家具和艺术品的来源及其意义。美国人民赞赏不已，报纸称她是极有才能的历史学家、艺术评论家和讲解员。杰奎琳把美、高雅、尊严和慈爱带进美国人的生活，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人能和她相比，后来也没有人能和她平起平坐。在她恢复白宫本来面目的努力中，她为美国人留下了一份永恒的财产。

九、古巴事件

肯尼迪仅仅在总统办公室里坐了踏踏实实的短短的几个月，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1960 年初，艾森豪威尔政府批准在中央情报局的指导下，训练和武装一支由古巴流亡分子组成的部队。在这一年总统选举前不久，中央情报局又决定将这支武装力量训练与培养成正规的部队，而不是一支游击队，并且要把人数扩编到 1 500 名。

1961 年 1 月 20 日，肯尼迪接手了这支部队及与之有关的一切计划。

接着在 4 月 17 日，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和武装的这 1,500 名古巴流亡者受到新任总统肯尼迪的批准在科奇诺斯湾（猪湾）入侵古巴。他们的使命是建立滩头阵地，并激起能够推翻卡斯特罗共产主义政权的民众暴动。

在下达命令之前，肯尼迪曾经倾听过国务卿、国防部长、海军上将及其他一些顾问们的意见。这些人中多数是“好战的入侵者”，或者是过于轻信美军实力的冒险者，对于行动计划，他们的意见是不同程度的赞同，虽然也有像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和遏制政策的“设计者”乔治·凯南这样的中间派的反对意见，但是这些反对意见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这些反对者没有一个挺身而出表示对侵略的

不满。

在这一次战役中，肯尼迪是一个强硬派，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不像他们设想的。

1961年4月17日星期一早晨，古巴流亡分子组成的第2056突击队的队员——大约有1500名不同种族、职业、阶级和党派的古巴人，他们受到充分的训练，并配备精良武器在他们所登陆的地方发起了攻击。

登陆地点四周全是沼泽，堵住了原以为在发生意外时可以撤回山里的去路，而这个地点却为经验丰富的卡斯特罗所熟悉。这群古巴流亡分子没有充分了解到埃斯坎布雷山脉离猪湾有80英里，这80英里路上是大片的沼泽与丛林，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对于肯尼迪命令下的这伙入侵者给予了坚决的回击。一支小小的空军部队击毁了美国人派来增援的两艘货轮，这使本来粮食、弹药严重短缺的突击队“雪上加霜”。而且入侵者们误以为，如果他们遇到势不可挡的抵抗，美国军队会随后支援，但支援没有来。卡斯特罗的坦克和军队把他们挡在海上，使他们根本不能在岸上安全地站住脚。在战斗中，为了使运送弹药补给的“阿特兰蒂斯”号能够幸免于卡斯特罗空军的袭击，船上的古巴船员要求提供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和喷气飞机来护航，他们甚至要求美军的大规模空中支援。

肯尼迪在猪湾事件中做了一件事——大概是他做对的唯一的一件事，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这关键时刻，他表现了克制，他拒绝提供大规模美国空中支援。保守的评论家汉纳·阿伦特写道，肯尼迪在总统任期内“最明显的一点

就是他未走极端。”也就是“真正的智慧”使他悬崖勒马，没有妄自尊大的把毫无希望的战斗继续下去。其实，肯尼迪这样做，也迫于一些方面的压力。艾德莱·史蒂文森提出要辞去联合国职务，并向肯尼迪发出“最后通牒”，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宣称“古巴不是独立的”，并暗示如果美国采取行动，苏联要进行报复，可能在柏林或东南亚。

在三天激烈的战斗之后，1 100 名突击队的幸存者投降。1962 年，美国交给古巴价值 5 300 万美元的食品与医疗用品，用来换取这些俘虏的释放。

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哀叹肯尼迪没有抓住机会去入侵古巴，认为肯尼迪在猪湾事件的“胆怯和优柔寡断”。而另一面，世界上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对于这起美国人策划的武装干涉感到震惊，因为在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这两位“遏制与解放”的设计者之后，肯尼迪似乎又是一位强硬派，热衷于美国政府一贯的反共产主义，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

虽然肯尼迪在古巴问题上被重重一击，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困境，被他在拉丁美洲争取建立进步联盟的计划抵消。为了更多的插手、干预，以至控制拉美，肯尼迪制定了一项总额为 100 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为了兑现在竞选活动中许下的诺言，即试图“创造一个能充分享受自由的拉丁美洲”，1961 年 8 月，在乌拉圭成立了争取进步同盟，在这次美洲会议上，美国签署了联盟宪章。联盟保证实行土地和税制改革，并保证由美国提供经济援助。

猪湾事件之后，肯尼迪对古巴采取了谨慎态度，继续用孤立的办法防止卡斯特罗式的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发展，

更没放弃武装干预的打算，为此常派 U—2 高空侦察飞机对古巴进行监视，征召了 15 万预备军人，允许古巴流亡者参加美国军队等等。

为了同美国抗争，古巴只好向苏联求援。赫鲁晓夫两次致信肯尼迪，明确告诉苏要给予古巴最大限度的援助。1962 年夏天，古巴革命政权的第二、三号领导人菲·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前往莫斯科，向苏联通报了古巴与美国的紧张关系，请求苏联采取果断行动。苏联不仅答应给予古巴一切必要的援助，而且决定在加勒比海这个最大的岛屿上建立一个足以震慑美洲广大地区的中程导弹体系。很快，苏联技术人员和设备来到古巴，导弹基地工程秘密开始了。

然而苏联的行动在美国已经被有关部门密切关注。有关古巴的空中摄影、间谍报告或其他情报等秘密资料引起肯尼迪的密切关注。1962 年 9 月 6 日，应苏联大使多勃雷宁要求，肯尼迪派特迪·索伦森与其会晤，索伦森向肯尼迪转交了赫鲁晓夫的一封私人信件：

“在美国国会选举之前，我们将不采取任何可能使国际形势复杂变化或加剧我们两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步骤……只要对方不采取任何会致变现状的行动……”

然而，肯尼迪认为赫鲁晓夫的话看来既空洞又是言不由衷的。苏联把军事人员、武器运往古巴，已经加剧了世界局势，并在美国国内政治事务中引起了混乱。

其实就在会谈的同时，42 枚苏联中近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正在被运往古巴，每一枚都能够携带一个威力比投在广岛

的原子弹大 20 或 30 倍的核弹头袭击美国，根据这些导弹部署的速度来判断，这一行动从春天起就在苏联国内，并在整个夏天一直在古巴境内进行筹划与准备。发射场已经选定了地方，勘查好了，运进了保护场地的防空导弹，改建了公路，赶走了当地居民。

9 月 11 日，苏联政府发表的一份声明干脆宣称，它的核火箭威力如此巨大，根本不需要布置在其他国家之内，这里特别提到了古巴。声明又说：“向古巴运去武器和装备完全是用来防御的，并不威胁到美国。”赫鲁晓夫与米高扬吩咐奥尔基·鲍尔沙科夫，这位苏联驻华盛顿官员传话说：苏联决不会在古巴部署任何射程能达到美国的导弹。

然而这个口信，很快被美国 L—2 高空侦察机的侦察行动揭穿为谎言，执行任务的 U—2 飞机对驶往古巴的每一艘苏联船只都拍了照片。每月两次对古巴全岛进行空中侦察飞行。8 月 31 日，L—2 侦察机拍摄到的照片，向肯尼迪提供了一批有意义的“可靠情报”：防空用的地对空导弹，保卫沿海地区的配备装备导弹的鱼雷快艇和大量增加的军事人员，但是这些照片和 9 月 5 日拍摄的照片（这批照片也照出了一些米格—21 战斗机）都没有提供有进攻性弹道导弹的证据。事实上，可以辨认出来的弹道导弹的证据，当时还没有到达。在不久之后的总统声明中，肯尼迪再次指出，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进攻性的地对地导弹或其他值得注意的具有进攻能力的武器的证据。不过，他又说：“如果确实是有这类武器，那就会出现最严重的问题了。”

10 月 9 日，肯尼迪批准了 U—2 侦察机对古巴岛西端的

再度侦察。这次飞行的主要目的是要获取有关苏联萨姆导弹实际活动的情报。之所以选择西端，是因为布置在此地的萨姆导弹据传有可能已可以用于作战；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侦察这个地区的军事集结情况，因为有情报表明在这个地区可能已有一个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场。由于气候不好，这次飞行推迟到10月14日才进行。U—2侦察机在那个万里无云的星期日凌晨，从南向北飞过了古巴西部傍晚的高空，他们在圣克斯托瓦尔地区发现了第一个苏联中程导弹基地的粗略的形迹。到了10月15日星期一晚上，分析人员对他们的发现已经相当确定了，10月16日星期二上午9点钟左右，一份详细的侦察结果报告被送到肯尼迪面前。肯尼迪虽然对赫鲁晓夫的欺骗行为十分恼火，并立刻意识到这件事关系重大，但他还是相当镇定地听完了这个消息，只是脸上流露出感到有点意外的神情，他完全没有料到苏联人企图在古巴这样一个地方采取如此轻率和冒险的行动，而且他接受了专家们的判断，即核武器这样的部署是同苏联的政策完全不符的。

上午11点45分，肯尼迪召集有关的重要人员在内阁会议室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十四五个人，是肯尼迪亲自指定的，这些人是后来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在这次会议上，当卡特将军和他的分析人员精确地指出那些证据时，肯尼迪才第一次看到了这些事关重大的照片，有些几乎辨认不出的痕迹竟然是汽车调度场，竖立的发射装置和导弹运输车，有些还装载着导弹。肯尼迪说，它们看来像“橄榄球场上的一些小球”，仅仅依稀可见。卡特说，苏联的中近程弹道导弹能击中1100海里以外的目标，华盛顿、达拉斯、卡

纳维斯尔角、圣路易以及这些地方之间的所有城市和战略空军司令部所属的基地都在其射程之内。据估计，这个由 16 枚到 24 枚导弹组成的综合发射物在两周内便可以投入战斗使用。从这些照片中，还没有发现有核弹头储存在这个地方的迹象，但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怀疑，那里已有了核弹头，或者很快就会有。

肯尼迪心情忧郁，但很干脆。他的第一个指示就是：要拍摄更多的照片，空军必须每天对古巴全境进行侦察，肯尼迪第二个指示是：要求到会的人暂时搁下所有其他工作，迅速而细致的通盘考虑一下面临的种种危险和一切可以采取的行动——因为肯尼迪认为采取行动已经刻不容缓，第三个指示是责成到会人员在事实真相能够宣布以前，严守秘密。

肯尼迪在忙于其他工作时，也考虑着他要做出什么反应，而且还深思着苏联人为什么采取这样激烈和危险的、一反常态的做法。显然，他们希望利用萨姆导弹乘美国忙于选举的机会，在 11 月以一个完成了的、可供给或使用的综合导弹系统，使美国大吃一惊。不过使肯尼迪思考的，是苏联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最终，肯尼迪做出了以下几种可能的分析。

第一种分析：冷战策略。赫鲁晓夫认为美国人太胆小，不敢冒核战争的危险。这是对美国抵抗意志的一次试探和考验，赫鲁晓夫在核武器上花了大量的金钱和力气之后，虽然希望永远不会在战争中使用它，但至少他想再试一试，用它来达到讹诈的目的。

第二种分析：一个转移注意力的圈套。如果美国真的进攻古巴，那么盟国就会出现分裂，联合国会感到震惊，拉丁

美洲国家的反美情绪会比过去更为激烈，而当美国部队和精力转移到这里来时，赫鲁晓夫就会迅速进入西柏林。

第三种分析：为了保卫古巴。肯尼迪认为苏联在西半球有一个卫星国对赫鲁晓夫来说十分有价值。这种价值表现在苏联的对外扩张政策方面。因此，赫鲁晓夫不能听任古巴垮掉。在肯尼迪看来，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美国敌对的拉丁美洲国家入侵古巴。这种入侵如果不能避免或不允许避免的话，美苏之间的直接武力对抗，甚至是核对抗就绝对不可避免了。

第四种分析：讨价还价的交易。赫鲁晓夫很了解古巴问题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所起的异常敏感作用，他企图利用这些导弹基地在一次最高级会议上或者在联合国中作为同肯尼迪交锋时讨价还价的有力筹码。从而以这些基地换取他所需要的那种柏林协定，或者换取美国从其海外军事基地，特别是亚洲的军事基地中撤出。

第五种分析：为显示导弹实力，随着美苏之间军备竞赛的发展，苏联已不再能充满信心的夸耀自己的导弹优势了。肯尼迪认为如果苏联在古巴设立军事基地，部署他们现有的中近程导弹和中远程弹道导弹，那么苏联手中以美国为目标的导弹总数会大大增加。而这些导弹能越过美国大多数导弹报警系统，在发射和到达这段时间里，实际使对方不可能不发生重大任何战术警报。

当然，肯尼迪认为如果任凭苏联在古巴的行动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对美苏双方之间现在的均势状态可能构成威胁。

肯尼迪分析种种可能之后，认为第三种和第五种分析可

能是苏联方面的动机，但理由也并不很充分。他认为第一种分析最有可能。但不管哪种分析正确，肯尼迪清楚的是，如果苏联行动得手的话，那么就会在整个冷战中“从物质方面和政治方面改变力量的均势”。

然而，在这些分析之后，肯尼迪又将选择怎样的决策，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当空中监视发现接近建成的导弹发射场时，肯尼迪及整个美国政府认识到自己的反应可能会决定苏联人民和美国人民的生死存亡，在10月的战略会议上，肯尼迪应用了他在猪湾事件和柏林危机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他不再仅仅依靠一个顾问小组，而是召集国家安全理事会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讨论采用非正式方式，而且往往分成若干小组进行；打算进行充分的辩论，提出新颖的解决方案。不久，讨论主要集中于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上，对导弹基地进行空中打击或者对古巴进行全面的封锁。

但肯尼迪与他的执委们进一步分析认为，采用“外科手术式”的空中打击有很大的困难。

首先，肯尼迪断言这种袭击不可能向美国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只通过几次出击在几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任务，而且这种袭击也不可能保证袭击的仅仅是发射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补充认为，如果这样限制空袭，那就是冒军方所不能接受的风险。卡斯特罗的飞机，还有近期到达的苏联米格飞机和伊尔——28轰炸机如果投入战斗的话可能会作出反应，回击美军的飞机和米塔那摩的基地或者甚至袭击美国东南部，萨姆导弹肯定会攻击美国的飞机，而且关塔那摩基地对面的古

巴炮台也有可能开火。核弹头的贮藏地如果被辨认出来的话，也不可能把它放过。所有这类目标或者其中大部分目标，一定要进行大规模轰炸才能摧毁。甚至到那时，美国空军并不敢向总统保证所有的导弹都能被摧毁掉或是其中一部分不会先向美国本土发射出核弹头来。

其次，肯尼迪认为空袭将直接地明白无误地攻击苏联的军事力量。因此更有可能激起苏联在军事上作出反应。完全不作反应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是不可能的。

总之，肯尼迪希望能以一种缓和的手段同苏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美国在这一事件中显然是占了主动，例如一个主张空袭的美国官员曾问肯尼迪：“如果我们采取空袭，苏联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我很了解苏联人”，他回答说，“我认为他们会把我们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摧毁掉。”“那时我们该怎么办？”“根据北大西洋公约，我们有义务摧毁苏联境内的一处基地。”“那么他们又会做出什么反应？”“噢，到那时，我希望双方都冷静下来，想进行谈判了。”

在答复肯尼迪的电报时，赫鲁晓夫建议美国拆除设在土耳其的一些过时的朱庇特导弹，作为苏联撤出古巴的交换条件。艾森豪威尔当时下令部署的 15 枚朱庇特导弹，据称是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但是它几乎没有什么军事价值。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肯尼迪不愿公开把它们拆走，理由是这将给予苏联宣传上的胜利，可是这种做法不必要冒着核战争的威胁。正如人们所估量的，首先，作为反应，对俄国船只进行封锁，比之冒险在古巴安置导弹，无疑是更为明智的举动。

1962 年 10 月 22 日晚 7 时，肯尼迪在电视中发表演说，

指出美国政府“正像它许诺的那样，一直在监视苏联在古巴岛的军事行动。上星期，许多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在这个大海环绕的海岛上，正在修建一个进攻性的导弹体系。这个导弹基地，除了提供一支进攻西半球的武装力量之外，不可能没有其他目的，有了这种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古巴将立即变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这就对所有美洲人的和平和安全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因此，肯尼迪决定封锁古巴，并安排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去直接负责这次行动，规定每一艘实施禁令的船只必须配备有能讲俄语的人员。肯尼迪下令世界各地的美军处于战备状态，同时要求苏联“在联合国官员监督下”，迅速拆除和撤走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23日，肯尼迪签发了“禁止进攻性武器运往古巴”的公告，宣布从24日起，美国可能拦截前往古巴的船只。

最初，赫鲁晓夫还想强硬下去。苏联外交部也退回美国封锁古巴的照令。10月26日，赫鲁晓夫写信给肯尼迪，建议美苏通过谈判来解决危机。但是，此刻底气十足的美国人在27日给赫鲁晓夫的复信中坚决要求苏联从古巴撤走进攻性武器。白宫发表声明说，苏联不这么做，美国就不与之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无可奈何，只得宣布于28日下午拆除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并且同意联合国派代表团去古巴“核实”。古巴政府对苏联此举十分不满，在声明中首先要求美国停止封锁、颠覆和侵犯古巴领海、领空等活动。在这种前提下允许联合国代表踏上古巴领土。

为了安抚古巴，赫鲁晓夫同卡斯特罗通信进行协商，而且派米高扬当说客前往哈瓦那进行安抚。直到了11月19日，

卡斯特罗才原则上同意拆除 42 个导弹发射台并与伊尔—28 轰炸机一起运回苏联，肯尼迪终于如愿以偿。11 月 20 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取消对古巴的封锁。持续了一个月的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了。

危机结束后的最终结果是：赫鲁晓夫宣布将撤走导弹；肯尼迪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将决不侵犯古巴，同时取消了 U—2 飞机的空中监视行动。导弹从古巴撤走了。左翼评论家曾说肯尼迪放弃秘密外交并向公众公开说明了这次危机。

客观的讲，这次古巴导弹危机没有演成热战，应当说是美苏妥协的结果。卡斯特罗后来说：“在吉隆滩之役后，帝国主义势力妄图以武力解决古巴问题的做法，引起了加勒比海危机（即古巴导弹危机）。美国政府在一度使世界处于核灾难边缘之后，便不得不进行妥协，承担不侵犯古巴的义务。”其实，妥协的不只是美国，可以说，苏联的让步更大。在整个事件中，赫鲁晓夫对肯尼迪实行冒险主义策略，后来又妥协让步，这成了他莽撞、冒失的有力证据。

古巴导弹危机虽然已经过去，然而美国反对古巴的活动仍在继续，但是比较温和，旨在“培养一种反抗和不满精神”。从导弹危机中脱胎而来的是，肯尼迪政府在 1963 年制订了一个外交政策的目标：缓和与超级大国的紧张关系。6 月间，肯尼迪在美国大学所作的温和演说本身就是冷战的解冻。肯尼迪在演说中敦促美国人不要跌入“像苏联人踏入的陷阱，不要只看到另一方被歪曲的和悲观失望的情景”。后来，他又说：“我们都居住在这个小小行星上。我们都呼吸一样的空气。我们都珍视我们子孙的将来。而且我们都是会死的。……我

们必须按它的现状而不是按它可能发生的情况去对待这个世界……”在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建立一条供紧急使用的热线，是双方缓和关系的又一例子。在美国大学发表演说后 10 天，两国就设立专用电传打字电报机签订了一项协定，而那条热线在夏季结束前就开始使用了。肯尼迪在缓和同苏联关系上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于 1963 年 10 月签署了一项协议，将价值二亿五千万美元的小麦出售给东欧国家。

肯尼迪在对外政策上，留下的最有力的遗产是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武器试验。关于这项禁试，自艾森豪威尔以来就进行过广泛的讨论，由于导弹危机之后人们变得清醒起来，促成了这项禁试的实现。在赫鲁晓夫 1963 年 5 月和 6 月与肯尼迪的通信中表示同意之后，肯尼迪政府的巡回大使埃夫里尔·里哈曼巧妙而迅速的议定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该条约于 8 月 5 日在莫斯科草签。当天肯尼迪立即通过电视向美国人民说明了情况，这是他最能打动听众的电视演说之一：

“今天晚上，我满怀希望地向你们说话……（自从）核武器出现以来，全人类一直在展开斗争，为的是避免在地球上出现大规模毁灭这一阴暗的前景。……昨天，一道亮光冲破了黑暗……

“这项条约并不意味着太平盛世。……但它是很重要的第一步——是走向和平的一步，是走向理智的一步，也是避免战争的一步……这项条约是为了我们大家，尤其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中国古代有句谚语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我们跨出这第一步吧！”

不到两周之后，肯尼迪送了一份措辞坚决的咨文给参议院，正式要求同意批准。他还在每次记者招待会上敦促参议院批准。在就减税问题发表电视演说时，他在开始的几分钟里就对这项条约表示赞同。肯尼迪还积极与抱骑墙态度的参议员分别交谈，与持反对和怀疑态度的参议员讨论。在每次谈话和信件往来中，他都精确地预料到并且答复了提出的每一个反对论点。

例如，有人争辩说，这个条约根本没有什么成就。肯尼迪同意这种说法，但他一再说“有限的”和“第一步”这两个词。他既强调指出条约所能起的作用，也提出它所不能起的作用。但是他又警告人们要注意继续进行的军备竞赛使大气层受到污染，以及听任核扩散所能导致的危险。

肯尼迪通过大量官方的、非官方的渠道进行工作，来争取更多的参议员和民众，在这种努力下，拥护条约的意见在7—9月间处于压倒优势。

参议院于9月以80票对19票通过了此项条约，尽管还有人反对，如国防建设承包商、前参谋农阿莱·伯克和阿瑟·雷德弗、内森·特文宁、科学家爱德华·特勒博士以及得克萨斯石油亿万富翁H·L·亨特，他资助反对条约的活动，但这项条约终于在10月生效，这是肯尼迪政府的一个重大事件，肯尼迪觉得在白宫期间没有任何一项其他成就比这令他满意了。

有人谴责肯尼迪玩弄权力，企图在有利于美国的时候冻结军备，而不去称赞他放弃60年代的核报复政策。但是结束了大气层中放射性坠尘危险的这个禁止核试验条约，在全世

界深受欢迎。10月，肯尼迪去西部各州旅途中，肯尼迪提到了核放射坠尘的终止，赢得了狂热的喝彩。

自这个时期开始，与苏联的直接的重要接触不再被认为是对美国“难以想象的破坏”。美苏在经历了长期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冷战之后，都认识到对抗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双方都从此走出对抗的阴影，由对峙走向缓和。

十、振兴经济

在约翰·肯尼迪就职后的 4 年里，美国经历了这个国家现代历史中时间最长，势头最猛的经济的发展。在这 4 年里，商品和劳务的增加超过先前的八年。1960 年，国民经济增长不到 3%，这是肯尼迪当时竞选时经常提到的一个要点。1961—1963 年三年的平均增长率几乎把这一水平提高了一倍。

1960 年，尼克松曾嘲笑过肯尼迪“对增长率方面的不满”，而肯尼迪自己的有些顾问也怀疑提及这些数字对大多数选民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对肯尼迪来说，这些数字就意味着解决就业问题。到 1963 年底，国民总产值达到创纪录的 1000 亿美元，增长率为 16%，为 275 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同时劳动收入也有了创纪录的增长。制造业的生产设备闲置的数字减少了一半；7000 万人就业大关也第一次被突破了；战后循环性的经济衰退的趋势基本上被打破了；1963 年“预期出现”经济衰退又给跳过了。所有表现经济状况的指标几乎都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但肯尼迪对这样的局面仍不满意。没有工作的人仍然太多了。在阿巴拉契亚，哈莱姆和全国各地的其他贫困中心，毫无希望的家庭仍然太多了。他仍要求自己在任期内，能够做出更多的事情。

肯尼迪并不要求把所有这些经济指标的增长完全归功于

联邦政府采取的行动，也不主张把他所采取的全部经济政策都说成是总统自己拟定的，肯尼迪在经济学方面没有多少正式的阅历。在竞选运动中，尼克松曾指责他“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连简单的中等学校的经济学也不懂。”年轻的肯尼迪在中学里也许的确没有学到过多少经济学，而且就这一点来说，他对其他任何地方的情况也没有了解过。

但作为总统，他能以其超人的才能吸收各种知识和提出各项适当的问题，这就大大弥补了他在经济方面的有限阅历。在他的周围聚集着美国历史上最有学识、最有发言权的一批经济学家。他认识到经济学家在他的各项决策中所起的作用。

应当着重指出的是，所有这些顾问，不论他们强调的内容有什么不同，都一致赞成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即失业人口太多，预算赤字在这个时期是不可避免和有帮助的，而消费者的购买力，应当由联邦政府比前一届联邦政府更切实有力地予以支持。肯尼迪对经济学家的意见最为重视，但同时，他也把自己阅读和观察的收获以及自己对美国国民和国会的情绪意识搀杂进去。他对向他提出的许多理论性的经济学说理解迟缓，但对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和问题却了解得很快。一个肯尼迪的老朋友和兼职顾问、经济学教授西摩·哈里斯及其夫人应邀到纽波特同肯尼迪一家一起观看 1962 年的“美国杯”赛马会。他在那里花了大量时间同肯尼迪讨论经济问题，后来他写道：

他的主要职责是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但使我们惊奇的是，总统竟花了这么多时间去钻研经济问题。他对这些问题那么感兴趣，在过去两年内学了那么多东西。现在，他是有

史以来在经济学领域最有学识的总统了。

1961年，肯尼迪作为当选总统委托保罗·塞缪尔森起草的那份特别研究小组的经济报告，直率地使用了“衰退”这个词，这个词在整个竞选运动中是应回避开的。但是，的确从各个方面的经济情况描述来看，衰退是存在的，而且不会自行消失。1961年2月2日，肯尼迪向国会送去了准备好几个星期的全面的经济咨文，提议通过下列法案：

- (1) 对失业津贴增加 13 个星期的临时补助。
- (2) 把救济金扩大到失业工人的子女。
- (3) 重新开发贫困地区。
- (4) 增加社会保险金。
- (5) 提高最低工作标准及其实施范围。
- (6) 给生产谷物的农民提供紧急救济。
- (7) 为全面的房屋建筑和贫民窟的清除计划提供经费。

在接下去的一个月，这七项措施中的第一项就成为法律，到6月底，全部法案都经总统签署批准了。这是161天里的行动。

这七项措施，并不像有些人所表示的，是微不足道和为时过晚的。因为经济复苏固然开始得很早，却是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对将近300万名失业工人增加了近8亿美元的失业救济；对75万名儿童及其父母提供了2亿美元以上的额外福利津贴；对1000个以上的贫困县及其父母拨出了4亿多美元的救济金；对新的最低工资标准以下的人拨出了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以提高他们的工资；根据新的住房建筑法，据估计提供了42万个建筑工人就业机会。所有这些，不能说是

“微不足道”的。

尽管在 162 天里采取的这些行政措施，大多数都增加了财政赤字，有的增加了几千万美元，有的增加了几十亿美元，但是它们都不需要等待立法或拨款。而且使任命他的许多议员惊奇的是，肯尼迪总统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都是个真正的节约者。他就职后的两项任务是，恢复经济繁荣和维持国防开支。不过他认为，由于过多的参与造成的必要数字的赤字同无节制的花费所造成的数字完全不同。

最后，在审查了 7 月份的数字，看不出有什么足以促使他和国会相信衰退的迹象之后，肯尼迪于 8 月 13 日在白宫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了一份经济报告。在报告结束时，肯尼迪保证将在 1963 年提出一项长期减税的法案。然而，这篇单调的演说以及此前在 6 月 7 日的一次关于赋税问题的声明，为历来最大胆，最有影响的经济措施之一——1963 年减税 100 亿美元的法案，奠定了基础。

肯尼迪的赋税法令，最后借助于他的继任人终于制定为法律。这项法律颁布前后，美国经济带来一个空前发展时期，这个法案及其成果已成为约翰·肯尼迪在经济方面的智慧和政治方面坚韧的纪念碑。

有人这样评价肯尼迪——不管他在经营学 A 课程中学了什么，他在白宫却接受了良好经济学教育。作为一个具有其他重任的人，他是一个好学生，而就整个国家来说，他是一个好老师。

最后，我们还不得不提及肯尼迪在他的反通货膨胀战斗中的一次关键性战役。为了防止通货膨胀，肯尼迪政府确定

了自愿的工资——物价指标,希望劳资双方都能尊重它。1962年,钢铁工人以钢铁业会避免提价的设想为依据,同意了一个不增加工资的契约。此后不久,美国钢铁公司宣布提高钢铁价格 3.5%,其他钢铁生产商立即仿效。

1962年4月,狂怒的肯尼迪总统出现在电视上,谴责“一小撮钢铁大王对个人权利和利润的追逐超过了他们的公共责任感。”据说,肯尼迪在私下里说,“我父亲总是对我说,所有实业家都是狗娘养的,但我直到现在才相信。”在肯尼迪和政府的压力之下,伯利钢铁公司首先压低了提高的价格,接着其他公司也这么做了。

一幅英国的漫画描绘了一个发怒的美国经理人员对另一个经理人员说:“肯尼迪这家伙认为是他在管理这个国家!”其实这个标题是正确的,肯尼迪的确在用自己的头脑管理着自己的国家。

十一、血洒政坛

1963年11月，得克萨斯这个肯尼迪在1960年险胜的州出现了反对他的情绪。许多政治巨头和大石油资本家对总统非常不满。肯尼迪必须与之斗争，才能确保在1964年的总统大选中起关键作用的这个州获胜。他相信他和他的妻子的魅力和气质能征服这些得克萨斯人。他已认识到杰奎琳的出行将是何等宝贵的政治财富，她用西班牙语发表演说一定会受到那里聚居的大批拉美裔人的欢迎。得克萨斯之行是总统夫人陪总统一起进行的第一次政治旅行，为了让那里的人们都能看到她，肯尼迪要求在城市行进时乘坐敞篷汽车，并不要警察的摩托车在两侧护卫，这样恰好使他不能幸免于阴谋的实现。

总统一行在上午11点37分从沃里堡飞抵达拉斯爱情广场。总统夫妇和州长约翰·康纳利夫妇接着乘坐一辆敞篷汽车前往市内，准备在达拉斯贸易中心发表预定的午宴演说。当车队穿过达拉斯市中心时，街道两旁人群的欢迎是热情的。康纳利夫人转身对肯尼迪说：“总统先生，你不能说达拉斯不喜欢你。”总统答道：“这是显而易见的。”12点30分，当总统的座车驶过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时，响起了枪声。一颗子弹穿透肯尼迪的脖子，第二颗致命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后脑的右侧。枪声把总统的头击碎在第一夫人的怀里，也把美国人民

的尊严和梦想击得粉碎。杰奎琳粉红色的服装上沾满了丈夫的脑浆和鲜血，她惊恐地喊道：“我的上帝，他们干了什么？我的上帝，他们杀死了杰克，他们杀死了我的丈夫……杰克，杰克！”然后不知所措地朝汽车尾部爬去。总统被立即送进医院，州长康纳利也受了伤。

4 分钟后，在当地柏克兰医院，马尔科姆·佩里医生在医院施行了气管切开术，并输了血和氧气。但总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心脏按摩没有能使他复活。根据当天晚上海军中校丁·丁·休姆斯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进行的尸体解剖，“颅骨创伤对大脑造成的广泛损害使死者不可能在受了这种伤后得救。”总统的遗体安放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供人瞻仰，大约 25 万人列队瞻仰了遗容。肯尼迪被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墓前燃烧着由肯尼迪夫人点燃的长明火焰。

我们用蒙太奇式的眼光，还可以看到总统遇刺时的另外一幕：凶手巧妙地避开了警戒网，携带着来福枪，潜入达拉斯的德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大楼第六层楼，从这里可以俯视爱尔姆大街，是总统车队必经之地。凶手装上了望远镜瞄准器，静待肯尼迪座车进入瞄准器光圈内。

12 点 30 分，历史性的时刻来临了。伴随着枪声，总统两手捂着领脖，身子直挺挺地倒下了。

当地警卫队循着枪声立即包围了教科书仓库大楼。警卫人员上楼搜查至第 6 层时，发现了里边放着一支 M·C·65 毫米来福枪。从枪上化验出指纹，是该大楼工作人员李·奥斯瓦尔德的指纹。

奥斯瓦尔德是怎样被抓获的呢？

暗杀击中肯尼迪后，奥斯瓦尔德立即弃枪而逃。途中，他受到一个警官的盘问。奥斯瓦尔德神色惶然，以为事已败露，不等警官继续查问，便掏出手枪打死了他。接着逃到近处得克萨斯剧院躲了起来。

不过，警卫人员很快跟踪发现线索，包围了这家剧院，其实警卫人员只是追查杀害那名警察的凶手，并不知道这个凶手又是暗杀肯尼迪的凶手。

当时剧院正在上演。警察便逐一盘问观众，当走到奥斯瓦尔德座位前命令他站起来的时候，奥斯瓦尔德作贼心虚，便同警察对抗地打了起来，自然最后被擒获。

在关押时，联邦调查局和当地保安警察根据查证，都认为奥斯瓦尔德毫无疑问是谋杀肯尼迪总统的凶手，但奥斯瓦尔德始终矢口否认。

11月24日中午，达拉斯市警察局要把奥斯瓦尔德移解到另一监狱去。当他被押出来时，闻讯赶来许多新闻界记者和市民围观。突然间，当地夜总会老板鲁比从人群里闪出来，拿着仿佛是儿童玩具似的手枪，向奥斯瓦尔德开了一枪，对方当场毙命。鲁比当众宣称，他为总统报了仇，将成为全美的英雄。但是，奥斯瓦尔德当众被枪杀，使得追查暗杀总统肯尼迪的阴谋的唯一线索从此中断。

肯尼迪被刺身亡，按照美国宪法：当在职总统突然死亡后，副总统自动晋升接替总统职务。约翰逊从达拉斯市返回白宫一周后，即11月29日任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为主席组织了调查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事件的委员会，这就是所谓的“沃伦委员会”。同时，约翰逊又责成联邦调查局全

面调查此案。

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对暗杀肯尼迪一案，看法大相径庭。于是，更使这件震惊本世纪 60 年代的大案，被笼罩在云雾迷茫之中。

在肯尼迪总统被刺几天里，中央情报局始终保持一种“是外国阴谋集团干的”的观点。就在肯尼迪被刺的第二天，即 11 月 23 日，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写有一份备忘录涉及该局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就是奥斯瓦尔德曾一度出逃苏联。在肯尼迪遇刺的前两个月他去过墨西哥城，并同驻当地的苏联副领事科斯季可夫联系签证事宜。中央情报局认为，科斯季可夫是克格勃的暗杀和破坏专家。因而据此有理由说：奥斯瓦尔德行刺肯尼迪是外国阴谋活动的一部分。他们进一步分析：如果这个情况属实，那么奥斯瓦尔德在讲出事件真相前就会被干掉。

这份备忘录无疑提出警告，就是奥斯瓦尔德虽然被关押，但仍处于可能被杀灭口的危险之中。备忘录由中央情报局联络处传送给联邦调查局。但是，两局机构关系紧张。在联邦调查局接到该份备忘录前，奥斯瓦尔德就已经被鲁比所杀死，犹如中央情报局警告的那样，因此也使中央情报局对肯尼迪暗杀案背景更持怀疑态度了。

在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不久，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康便向约翰逊总统通报了肯尼迪被刺的情况，也是后来留下的有关情况的唯一备忘录。这份第一次情况介绍只是暗示肯尼迪遇刺属暗杀性质，但并没有说，麦康对中央情报局关于奥斯瓦尔德安全感到担心。麦康第 2 次情况介绍是在 11 月 24

日上午，中央情报局认为，这件肯尼迪暗杀案完全有可能是古巴搞的一起阴谋。

这个说法，即暗杀肯尼迪是古巴阴谋，在中央情报局广为流传。11月25日有人对美国驻墨西哥城大使馆官员说，9月17日即肯尼迪遇刺前两个月，他在古巴领事馆。他说，当时奥斯瓦尔德在那里曾谈过暗杀肯尼迪一事。古巴人给了奥斯瓦尔德6500美元。在墨西哥城的中央情报局活动站打电话给总局说他们了解到，卡斯特罗在9月份曾威胁要对付美国领导人。这些消息情报，都使中央情报局怀疑古巴或苏联与肯尼迪遇刺一案有关。

中央情报局得出这类印象，往往出于自然，因为该局把调查任务交给了针对克格勃而成立的安格尔顿的反间谍情报司。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在分头调查肯尼迪遇刺案。但安格尔顿的反间谍专家对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持怀疑态度，因为那个调查完全忽略了奥斯瓦尔德的怪异行为。在安格尔顿的专家看来，奥斯瓦尔德的诡秘行为，完全是一个外国搞情报活动的情报人员的行为。他用化名，把邮局信箱作为联络工具。在肯尼迪被刺前两周，才把家从新奥尔良迁往达拉斯市，并与家人分居。专家们还认为，奥斯瓦尔德去墨西哥城，是情报人员定期出国以便于秘密接头的惯常做法。

但是，肯尼迪遇刺后第四天，美国司法部建议白宫公开宣布暗杀肯尼迪是奥斯瓦尔德一人干的。美国司法部部长卡曾巴赫在11月26日致信总统助理莫耶斯，说：“重要的是，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所有事实都应以美国人民和外国人能够满意的方式公布于众。现在应该发表一项关于这一问题的

声明：‘奥斯瓦尔德就是刺客，他没有仍然在逃的同伙，证据非常充分，可以审讯判罪。’信中还说，“我们必须反驳这样一种想法：这是一起共和党阴谋或者是试图嫁祸于共和党的右翼的阴谋。”

约翰逊大约是想接受这个建议设想，因而在 11 月 26 日对麦康说：联邦调查局负责进行调查，中央情报局只起助手作用。然而，肯尼迪遇刺后，社会舆论种种猜测，议论纷然，连总统都被人如此轻易暗杀，美国平民自然也有各种各样怀疑和担忧，再加上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两个安全机构明显不和，因此约翰逊总统下令成立沃伦委员会，调查此案，与联邦调查局分别调查。

沃伦委员会在调查中收集了上千份证明文件，听取了 552 个人的证词。调查报告于 1964 年 10 月发表。报告结论是：奥斯瓦尔德是凶手。至于奥斯瓦尔德暗杀动机，报告列出 5 点分析：

1. 仇恨一切权力；
2. 凶手与人们不能建立和谐关系；
3. 有强烈的出名欲望；
4. 具有（施展）暴力能力（倾向）；
5. 他信仰暴力革命。

暗杀肯尼迪是奥斯瓦尔德单独干的，这个结论，也是联邦调查局的结论。联邦调查局在肯尼迪遇刺后第 18 天，向白宫和沃伦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在报告里没有提交发现阴谋活动的证据。调查报告的结论是：

1. 是奥斯瓦尔德枪杀了总统；

2. 奥斯瓦尔德的暗杀活动与任何性质、种类或形式的阴谋都没有关联。

司法部副部长卡曾巴赫立即要求沃伦委员会把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所发现的材料公布于众，以消除社会疑虑重重的猜测。

不过，沃伦委员会作为负责调查肯尼迪被刺一案的权威机构，它作的调查报告一经公布，相反立即引起美国舆论哗然。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政治活动家、众参两院议员，或是学者都纷纷对沃伦委员会报告提出质询。

因为最明显的证据是：肯尼迪那份检验报告是受两处致命伤，而且与康纳利被击中时间相差不到两秒钟，这些用一支来福枪都是办不到的。就是说，除奥斯瓦尔德外，至少还有一名凶手。由此可以推断，行刺肯尼迪是有准备的组织活动，或者说，是一个阴谋。

由此，关于肯尼迪遇刺一案便有了种种猜测分析。

如在调查过程中，有证人提到，奥斯瓦尔德受雇于联邦调查局，每月领取 200 美元，情报代号为 S—172（或者 S—179）。这样有人猜测，谋杀肯尼迪的线索又伸进联邦调查局。

如奥斯瓦尔德在名义上是亲卡斯特罗组织的成员，实际上他与反卡斯特罗组织有密切关系，与古巴流亡人员过往甚密。他是由积·贝奈斯特介绍参与他们的活动。但肯尼迪遇刺后，贝奈斯特死于心脏病，原定被传到沃伦委员会去作证自然无法出席了。

当时有个名叫“莫里斯·毕索普”的中央情报局军人，直接领导古巴流亡人员活动。据一个古巴流亡人员维西阿那

——有名的反卡斯特罗组织“阿尔发——66”组织者证实，在1963年9月初，毕索普把维西阿那召到达拉斯，见面时有奥斯瓦尔德在场。肯尼迪被刺后，维西阿那从报上看到了奥斯瓦尔德的照片。他有一个外甥在驻墨西哥的古巴大使馆工作。毕索普对维西阿那说，要他协助，让他外甥选择性证明奥斯瓦尔德经常到该大使馆去，这些是肯尼迪被刺前几周。

有人证实，这是中央情报局华盛顿兰利总部一位军官化名。为了找到这个“毕索普”，侦察人员曾经让维西阿那同兰利总部的“毕索普”见面。结果维西阿那不认识那人，那位军官也不认识维西阿那。然而不久，维西阿那遭到了杀手袭击，但活了下来。

因而据这些材料，好事的分析家同60年代美国与古巴关系联系起来。60年代初，肯尼迪要从越南撤军，同中央情报局内鹰派发生了冲突。美国鹰派势力把肯尼迪总统的举措看做是危险倾向。而对古巴流亡者来说，肯尼迪背判了“自由事业”。并且从1963年9月起，肯尼迪与卡斯特罗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秘密接触。如果肯尼迪从达拉斯返回华盛顿后，极可能要在短期内派特使威廉·埃特伍德去古巴，同卡斯特罗接触，从而导致美国与古巴关系正常化。肯尼迪由于与中央情报局关系不和，曾专门指示，这些情况要对中央情报局保密。埃特伍德与历史学家施莱辛格分析，认为中央情报局可能在美国与哈瓦那的电话线上安了窃听器，已获悉了一切。这样又与另一情况联系了起来。就在11月22日下午，即肯尼迪遇刺的那天下午，白宫的先进的窃听系统被拆除了。什么原因，不得而知。在肯尼迪执政的最后两个星期里，白

宫的窃听系统没有装上用于窃听的磁带。这种联系意味着什么，只有当事者才能清楚。

所以，埃特伍德认为：如果把美古关系正常化的消息传到古巴流亡者那里，他们会与中央情报局内鹰派联合起来，可能诉诸暴力，比如杀死总统。施莱辛格表示赞同这种分析。

然而，约翰逊总统当时在私下表示了看法，认为是卡斯特罗插手了这起暗杀阴谋。

肯尼迪遇刺一案，至今已 30 多年了。在漫长的岁月里，围绕着此案发生了种种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有一点倒是越来越清楚，就是知情人是越来越少了。至于将来会有什么记载在案的文件披露，谁也难以预料。

肯尼迪遇刺的真相，至今仍是谜。